

# 赛-扎哈利对李光耀的控诉（全文）

——节选自赛-扎哈利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和《万千梦魇》

编者按：赛-扎哈利(Said Zahari)出生于1928年5月18日英国人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二战后求学时期即受到马来亚和印尼的反殖民族主义者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关注争取国家独立的政治风云。

1951年起投身报界，在英国人视为肉中刺的《马来前锋报》工作。1960年代，由于他跟新加坡人民党的领袖以及其他进步工团和大学学生会的领袖关系密切，并且一再拒绝李光耀对他的“关怀照顾”，令李光耀恼羞成怒，于是，他便在李光耀政权于1963年2月2日发动的一次所谓“冷藏行动”的大逮捕中逮捕。从此，他就在共产党、亲共和马来沙文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罪名下，不经审讯地被关押和拘留至1979年底。前后时间长达十七年。在这十七年当中，赛-扎哈利与李光耀反共反民主的野蛮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誓不低头。最后，李光耀无计可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把他释放。

赛-扎哈利1989年底得到时任马来西亚首相兼内政部长的马哈迪医生的批准，允许他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马来西亚定居，使他感受到重新回到马来西亚居住后，不仅给自己开拓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且可以开始呼吸到远比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新加坡岛“新鲜和清新的政治空气”。1996年-1999年，他荣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传播系客卿作家。2001年5月荣获“2001年报业自由奖”。2003年底接受国内安全局网页《马来西亚公报》邀请，担任常驻作者。

赛-扎哈利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帝反殖斗士，也是一位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他在被李光耀政权逮捕之前，就已是马来马来记者协会会长。除了马来文，他还精通英文，懂华文。在文学方面，他也很有才华，擅长于写诗、著述和翻译。他对中国文学甚感兴趣，特别是对鲁迅的杂文和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在饱尝李光耀政权的“铁窗风味”期间，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极其恶劣条件下，向华族难友努力刻苦学习华文的同时，曾把鲁迅的一些著作翻译成马来文。

1997年10月，赛-扎哈利夫妇首次访问了神往已久的中国，东道主把夫妇俩带到历史性的天安门广场。赛-扎哈利后来在其《人间正道》回忆录里提及这件事时，情不自禁地写道：“……像其他游客一样拍照留念之后，我站在一个角落，观赏宏伟的天安门广场。我似乎听到人民在听到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宣布大革命胜利后发出的如雷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时刻，我心目中看到毛主席威武地站着，周围是其他的革命领导，他们在站台上挥手，迎接他们民族伟大胜利的呼声。……我激赏毛泽东的才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最后解放了中国人民……”。

迄今为止，赛-扎哈利前后写了两本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马来文名“Meliti Lautan Bergelora”）和《万千梦魇》（马来文名“Dalam Ribuan Mimpi Gelisah”），控诉英帝国主义和李光耀野蛮残酷镇压和迫害反帝反殖人士的累累罪行，书中所记录的内容，都是作者以及其他被迫害者的亲身经历。这两本书由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赖顺吉翻译。

以下是节选自两本回忆录里的有关内容，以飨读者：

(一)

第28章 壮志未酬

会议结束后归来

1963年2月1日，新加坡人民党在武吉知马路召开中央特别会议，结束时大约是午夜十二点。吃过一点夜宵，大伙儿就散会了。……（此处略）

三小时后被捕

约三个小时后，我被逮捕。原定和我一起当天早上十点飞去雅加达的马哈迪哇也一样。同时一起被捕的还有胡森-扎希汀、华哈-沙、冯俊田、沙拉胡汀-高斯、多米尼-普都遮里、林清祥和其他百余名社阵、人民党、工团、乡村委员会，南大和新大的领袖，以及几位华文报的记者。我们都是在一项称为“冷藏行动”的全新加坡岛大逮捕行动中被捕。

那个斋戒月的清晨，我被六位政治部人员带走，他们乘两部车子，另外还有一辆由全副武装的嘉加兵护卫的军车。车子里的人都沉默不出声。

在寂静中，我忽然想起一年前李光耀在立法议会厅碰见我时对我说的那一番话：“赛，你得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否则，你会迷失，漂流向社阵或人民党，那肯定会给我的工作增添麻烦……。”

我也记起他讲这些话时，神情认真，满以为我会去附和他。那天清晨，在车子里胡思乱想时，我也记起李光耀邀我找一个更适当的时间聊聊，因为他当时是赶着进去立法院开会。李光耀的声音，随伴着那一席话，一直在我耳边盘桓着、回响着。

我心中浮现好几个问题。这次斋戒月凌晨的逮捕，是不是李光耀要防止我迷失，漂流入人民党的一项步骤？是不是因为要避免给他的工作增添麻烦，就该把我送去樟宜监狱冷藏起来？我的心儿在跳跃。除了李光耀本身，没有其他人能够回答我心中的问题。可是，李光耀当然没有兴趣回答。

我决定加入人民党，是经过深思熟虑，是在完全清醒和自愿情况下作出的决定，不是李光耀所担心的那样迷迷糊糊漂流入那个党。我接受出任人民党主席，是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和准备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面对一切挑战和障碍的。

忽然，我从胡思乱想中惊觉过来，坐在司机旁，我面前的哈欣警长忽然开口说：“哗，赛先生，明天报章一定有很多关于赛先生被捕的新闻。”

“我想不会吧。难道抓我一个人可以成什么大新闻？”我回答，希望哈欣警长能够提供更多一些当天逮捕的详情。

“哦！肯定是大新闻，因为很多赛先生的朋友也一起被捕。”他解释说。

我独自微笑，心中早出现那些必将被捕人士的影子。哈欣警长不再说话了。我也没兴趣多

问。我的思路从一幕转向另一幕，没有确定的东西。通过心中的眼睛，我看到一个个战友在睡梦中被叫醒，然后一个个都像我一样，在前往监牢途中。有的告别妻子儿女，有的离开父母双亲，有的挥别爱人，被带去政治扣留营过牢狱生活。而又不知道那将是到何期何日！

斋戒月的清晨还是那麽寂静，载着我的车子继续驶向芽笼士乃路，朝向欧南监狱。在那儿，我将开始过政治扣留者的新生活，我根本没预料到和想象过那会拖至十多年。从欧南监狱，我被塞去樟宜牢房。从樟宜再转去“中等监视牢房”，再从那儿转去明月湾总监狱。最后是放逐到乌敏岛去，加起来总共是整整十七年！

所有重组新加坡人民党的政治抱负，随着我的被捕而无法推展。人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 第 29 章 漫漫未央夜

哀伤  
往往好些时候  
它似乎无尽而无始。  
仿佛那白昼苦短  
漫漫黑夜长无尽  
千万个恶梦哪  
山峰骤然望天长  
森林骤然而密实  
河中的水不再流  
长空怒云密布  
恶蛇吞蚀明月  
繁星惊呼惶恐·  
寻找炎炎红太阳啊，  
我盼望着你的光辉  
\*1968 年

狱中写诗

(此节略)

十七载漫漫长夜

在新加坡，自史丹福-莱佛士 1819 年登陆以来，历史就受到严重歪曲。以上那种寂寞和憧憬的感觉，在我十七年作为这个岛国的政治扣留者和流放者的生活中经常都出现。因此，遇到这种寂寞和憧憬时，我先接受事实，然后倾力作出反击，然后再用坚持维护要建立普世真理的生活原则的胜利热情，去把它遮盖掉。而这些感受其实只是很小很小的牺牲而已。

我们被逮捕、扣留，肉体和精神都被虐待和折磨，然后要我们承认犯错及悔过。不只是悔过，悔过后还得保证不再“重犯做错的事”，还要被迫去歌颂抓我们的人。

我们在“维持公共治安法令”下被捕。在该项法令下，被捕者不必在公开法庭受审。因为这样，我们被称为政治扣留者，不是刑事犯。我们被扣留的日子可以随意延长，完全由抓我们的那个人决定，而他却是被扣留人士的政敌。

由于忍受不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好多政扣者向抓我们的人要求低头，写下了自白书，其中一些在释放前还被迫上电视去表白，去接受特务的访问。

在被捕当初，他们一概把我们打成马共份子或亲共或共产党统战份子，指我们要用暴力推翻人民行动党政府。实际上，政扣者是按宪法规定操作的合法政党的成员或是合法工团或学生团体的成员。

如果带到公开法庭，以这样的罪名进行提控，肯定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罪名成立。于是，政扣者就不用经过公开法庭审讯。“维持公共治安法令”就是这样不公平和残酷。它的应用就只是为了保障当时执政党，就是人民行动党。

我也受到同样的指责。控状之中，除了指我是共产党统一阵线的主要人物外，还指我是“接受外国金钱的份子”。当我提出挑战在公开法庭承审时，抓我的人显然害怕了，厚着脸皮假装听不见。我不久后再提出挑战，他们还是装着听不见，脸皮显得越来越厚，越来越无耻。过后，他们静悄悄地把“外国特务”的罪名从控状中偷偷拿掉。

可是，我还是继续被扣留，两年后又两年，两年后又再两年，一直到最后，总共加起来已经将近十六年了。叫我在那样残酷法令下继续被扣留的罪名，是政治意味非常重的指控：共产党统战份子，反对新、马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

在上述罪名下逮捕和扣留我们之后，人民行动党举行大选，取得胜利。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但是，两年还不到，新加坡就被逐出马来西亚。可是，我们还是继续被扣留，虽然反对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的罪名已经不适合列入控状之中。

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扣留我呢？

“只是带走一阵子”

1977年，当我在樟宜监狱明月湾扣留营第八度接到延长两年的继续扣留令时，深深地笑了，很想大笑一番。发给我扣留令的那个警官，如果没错的话是南里，他问我为什么笑。“你很喜欢再延长两年吗？够了，赛，……，不想出去吗？赛，想想你的家人。”他在跟我说教了。这南里的心地好，但他是多么简单看待我被扣留的问题啊，对和错，迫害与否，公平吗？残暴吗？他都不管！

我对他的同情的说词早已经是麻木了，已经厌倦要回答和解释我对自己被扣留的立场。被扣留初期，在被提醒有关家庭的福利和幸福时，我会反击。“关你什么事？”我对他们怒吼。但是，那天我心很软，或许在扣留营中等待自由等了超过十年，已经累了。

所以，那天听到南里的说教，我没有反击。如果是从前，我在受促在延长扣留令上签名时，会喊道：“叫李光耀无条件释放我！”那天，我作同样的要求，也拒绝在延长扣留令上签名，但

语气很软，不责骂南里和其他只是在执行任务的官员。

事实上，我那天早上笑，是因为感到实在太可笑了。我确实已经知道新的扣留令那天会发下来，因为之前的两年期限正好是在那一天到期。我在看到新扣留令时发笑，是因为在那时刻忽然想起哈欣副警监在1963年2月2日凌晨逮捕我时讲过的话。

哈欣副警监的话在我耳边响起。他其实是在对站在我身旁的妻子说的：“莎拉玛女士，别担心，我们只是要把赛带离一阵子而已，不会久，只是想问一点点东西。”他装得很关心的样子在解释。莎拉玛望向我，似乎要问：“真的吗？”

他所说的“一阵子”，在我那天从南里手中接过最新的扣留令时，已经是拖到十六年了。在十六年中，我换过了三、四个监狱。

### 单独监禁和迫害

开始是在欧南路的监狱，呆了一个星期，被移到上必麒麟街中央警署的扣留中心。这是座多层建筑物，最高一层有著名的称号：顶楼中心，特别用作政扣者受盘问时单独囚禁用途。

只有在单独监禁囚室中，我才领悟到哈欣副总监所谓的“只是问一点东西”的意思。“只是问一点东西”，其实是从早上到中午，中午到下午，下午到晚上，继续到第二天早上，到中午，到晚上，…的连续不断的盘问。“只是问一点东西”，我耳际似乎响起哈欣副警监的话。

从单独囚室出来，就是进入审问房。连吃饭的时间也受盘问。哈欣和另外三个人盘问我。审问室的冷气开到最大，桌子上我看到三本大簿，其中一位我后来知道是名叫勒加普的官员在翻着。当他在她面前坐下，勒加普警长即刻说话：“你知道这里头写着什么吗？”

“我怎么会知道？书又不是我的。”我回答。

面孔有点凶悍的勒加普那天就要向我表达他的凶性。“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全部秘密都写在这些书中。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他故意提高声量说话。

“什么秘密呢？”我回问。

“赛，不要在我们面前吹牛装蒜。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清楚，几点离开家，去哪里，跟谁吃午餐，在哪一家戏院看戏，在哪一家油站打油，几点回到家，通通我们都知道。”勒加普警长洋洋自得地说。

“哦！是这些秘密，懂了就算了。我不介意。”我回答。

我这才想起在被捕前的几个月，我的车子被跟踪。在几个我常到的地点和屋子，总是看到可疑的人物。每一回我开车进入在武吉知马路的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去上“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课时，总是看到一辆车停在路旁，车中总是有两、三个形迹可疑的人。

上完课后，我从大威路离开校园。那儿也有一辆车停在路旁。但我一直都不太管他们的行

踪。

“不要逞英雄”

勒加普警长在我讲我不介意他们知道我的秘密时，急躁了：“不要逞英雄，赛，以后你会后悔的。”他说。

我还来不及回答，哈欣副警监插嘴说：“赛，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坦白，在我们之间，坦白说出你的活动，方便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接着，哈欣副警监忽然提起十二年前的事，那时，他和我一起以私人考生身份参加高等剑桥文凭考试。我们当时双双都已经有了工作，他任警官，我是《马来前锋报》的记者。那之后，他就不曾再见过我。“没想到我们会在这儿见面，赛。”哈欣说。我只是听着他所讲的故事。

然后，哈欣副警监企图套我：“赛，你知道吗，林清祥已经招出你的全部活动的情况。你就不用那么辛苦躲躲藏藏了。”

我听到他讲林清祥的名字时，真想纵身大笑。可我却忍住，只是向哈欣说：假如林清祥真的已经那么做，还要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就相信林清祥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吧！”我说。

“我们要你合作。”他加重语气，“要你回答所有有关你的活动的问题。”

我再一次重复：“就相信林清祥所讲的吧。我干嘛要跟抓我的人合作？”

哈欣不再多说。他避免跟我谈他要求我给予合作的话题。当天早上的盘问在午餐时间左右结束。我被送回单独牢房吃饭，饭渗着沙，加咖喱咸鱼，咖喱水淡而无味，一杯奶茶，好像是雨后的河泥水。

但是我得要有气力，得吃饭，我心底对自己说。于是我念祷文歌颂伟大的真主，我把渗在饭中的沙检出放一旁，饭吃下肚。吃完了我再念祷文感谢真主。茶水也喝干了，当作是很美味的样子。才要把头躺在石床上休息一会儿，辜加警察已打开牢房门，叫我到审问室去作下午阶段的盘问。

哈欣没来。那天下午只有勒加普盘问我。他由一位二巡警察陪同。我想他会再用林清祥的名字来叫我合作。其实却没有，有关林清祥的谎言已经曝光了。

勒加普问我在新加坡及 1961 年末被禁进入马来亚时跟印尼大使馆的关系。他问我 1958 年访问该共和国时做些什么，以及我为什么那么“亲苏加诺”。他说他有照片显示我跟几位记者在一块，其中一位是印尼共产党人，等等。

我很轻易地回答他的问题。作为《马来前锋报》的编辑，我全心全意继承《马来前锋报》长期以来支持印尼人民斗争的传统。那时候，印尼正全力实现其独立。印尼人民正在西伊利安清理荷兰的残余势力。同时，当时正值 1955 年万隆会议之后，苏加诺、尼赫鲁、纳塞、西哈努克亲王和周恩来一起致力领导亚非民族奋起，争取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解放出来。

1957 年底，马来亚庆祝独立时，联合邦政府邀请几位印尼记者到马访问。我身为马来亚马来记者协会会长，在吉隆坡一家餐馆设晚宴，招待印尼的记者们。他们包括阿当-马力克、莫达-如比斯、利思汉-安华、乃巴贺和哈欣-拉曼，都是印尼主要大报，包括《印尼火炬报》、《大印度尼西亚报》、《独立报》、《人民日报》和《东方之星报》的主编，另外还有当时由阿当-马力克为首的安达拉新闻社。阿当-马力后来出任印尼外长和联合国主席。

勒加普所指的那张照片是一位印尼记者所摄，照片中我跟阿当-马力克、印共喉舌报《人民日报》主编乃巴贺、《东方之星》主编哈欣-拉曼、墨兰-阿都拉和其他一、两个人。

诬赖为“外国特务”

“我认识大使馆内的几个官员。”我回答。

“基于什么事务？”勒加普警长再问。

“我作为一名报人的工作需要。”我回答。

“你曾经从印尼大使馆取得金钱付款吗？”

“有。”我回答。

勒加普坐着的身子猛然一震。他听到我的答复后感到吃惊。（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被安上拿外国钱当特务的罪名。）

“你真的从印尼大使馆拿过钱？”勒加普重复问题，似乎不相信那个答案。

“的确是真的有。”我坦白说。

“你一共拿了多少钱？做什么用途？”他接着问。

他脸很严肃地等待着我对那最后一道问题的答案。他给我看一张大约只有平常护照照片大小的一半的小照片。那是黑白照，里头的人根本看不清楚。“你认得他是谁吗？”勒加普警长问。

我拿过照片仔细看。“不，我不认识。”把那张照片还给了他。

“你怎麼可能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你。我们已经抓到他了。”勒加普警长继续说。

“很多人都会说认识我。在被捕之前，我也认识很多人，一些是外国人，像来自伦敦、加拿大、德国和日本，自称是作研究的作家而要访问我的。这照片中的人我不认识。”我解释。

“他说他给过你钱，是这个人给你钱吗？”

勒加普显然在听到我对从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馆拿钱的解释后，感到非常失望。我对他说，

印尼大使馆给我一张志银新币 250 元的支票，是支付一百本小书的费用。那本名为《西伊利安——肉中之刺》的小册子是我写的，他们跟我买一百本。

我写那本书，是要表达我支持印尼人民要收复还在荷兰统治下的西伊利安，使它回到印尼共和国怀抱的斗争。听过我的答复，勒加普警长不要再谈这件事了。

在按计划要飞往雅加达出席亚非新闻从业员秘书处会议的前一天，我把那张 250 元的支票交给在新加坡亚太新闻社工作的好友陈加昌，跟他换现款。当陈加昌从另一位记者同僚获知我在原定飞往雅加达的 2 月 2 日那天清晨在“冷藏行动”中被捕时，着实吓了一跳。

1996 年，当我跟陈加昌在新加坡会面时，他告诉我，那张印尼大使馆的支票使他感到失措。他不敢到印尼银行去兑现，只好收着那张支票，到我释放后还给我。谈起这张印尼大使馆的支票的波折，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当盘问围绕着我跟印尼的关系的话题时，哈欣副警监跑进来审问室。他们两人耳语一番之后，一起坐下。我接着再被盘问，除了西伊利安，还有我还在哪些方面支持印尼的政治。

“比如说，你对苏加诺的‘指导民主’有什么看法？”勒加普问。

我说：“‘指导民主’可能是当时印尼政局中最适当的统治制度。”

下来，他们问关于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和《万隆宣言》，以及关于《五大原则》。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我全力的支持。然后，他们看来已经没有再追问我跟印尼的关系的本钱了。哈欣副警监然后告诉我说晚上会有一位政治部高官要见我。

“赛，你好好想清楚。如果肯合作，就可以很快释放。今晚，你就有机会这么做。”哈欣副警监说。

### 第 30 章 枪杀威胁

阿末-克罕盘问

阿末-克罕是新加坡政治部的副总监，巴基斯坦裔人，据说曾在英国 M15 情报局任职。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来到新加坡担任政治部的副总监。他是以擅长“反共”事务的情报员而闻名。在新的审问室中，阿末-克罕给包括哈欣和勒加普在内的六位官员夹在中间。他的右边坐着哈欣，勒加普坐在左边。

“我听说你不肯合作，”阿末-克罕开始他的说教，“我希望你改变态度，为你自己的好处而跟我们合作。”

看到我没有反应，阿末-克罕继续他的说教，讲了种种关于共产党的危险性，他自称共产主义正威胁着新加坡和马来亚。“我们需要你的合作来克服共产党威胁。”他说。

“我跟共产党无关。我在毫无理由情况下被捕，然后给加上各种荒唐的罪名。我要求即刻



无条件释放我。”我回答。

“没那么容易，赛先生。我们有很多关于你参与颠覆活动的证据。”阿末-克罕声称说。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按法律控我上法庭？”我挑战他。

“我们不需要控你上法庭。我们要你跟我们合作。”他回答。

我接着重复我对哈欣和勒加普讲过的话：“为什么我要跟抓我的人合作。”

“因为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阿末-克罕打断我的问题。

我保持沉默，不想跟这个阿末-克罕对答。

“赛先生，你是个明白人，有头脑，会想，你应该知道如何为自己和家庭着想？如果肯合作，你可以很快获得释放。”他说。

我无反应。他恼了，先转向哈欣，然后再看向勒加普，他对他的下属官员说：“这个人很顽固。”

“好啦！既然你那么顽固，不要合作，你会面对后果的。你可能给杀掉，你懂吗？我们可以在半夜把你送去其他地方。半路上，把你推下车，做到好像你企图逃跑，然后用枪从后面射死你。”那位曾经担任英国特务的阿末-克罕威胁我。他的六个随从，都是马来官员，都静静地听着他对我的生命所作出的死亡威胁。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现场证人，都亲自听到要杀死我的威胁。我望向哈欣。他低下头，不敢看我。

（那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向律师知知拉惹投诉，问他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对付阿末-克罕。知知拉惹说：“赛，别再提了。不值得对这些懦夫采取什么行动的。”我同意，过后就不再提它了。）

我听了那项威胁感到是被挑衅了，于是我回答：“是的，我知道你可以这样杀死我。殖民者和他们的特务不久前在刚果和非洲的确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干下那些勾当。”

阿末-克罕注视我的脸好一会儿。然后，他二话不说，站起来离开审问室，那些在审问过程中一言不发的官员也跟着出去了。一位辜加警察进来押我回到牢房去。

烦躁不安之夜

那晚上我烦躁不安，很难闭上眼就寝，总是想着阿末-克罕的恐吓和要胁。每一回辜加警察从牢房的“偷窥洞”监视我，我都被惊动，赶忙坐在床上，等待看他们是否会在三更半夜打开牢房门，把我送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脑海出现幻影，自己好像被押着离开牢房，离开扣留所大楼，然后到大路上，然后感到有人用手在我身后一推，我逃跑。“砰！砰！”枪声响了。我还来得及回头一看，阿末-克罕正把手枪指着我。

我从幻觉中醒过来，大力敲着牢门。辜加警察再来洞口“偷窥”，我对他做手势表示要上厕所。他回去守卫室拿锁匙，回来打开门。当我重回牢房时，看辜加警察的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第二天一整天，我不再受盘问，没有人来看我，再下来一天也没人来。第三天，我感到很寂寞，已经有三天没讲话了。那一刻，我真想有人来“盘问”，管他是谁，只要是有人来跟我说话。我尝试跟监视我上、下午各十五分钟运动的辜加警察讲话，可是，他却对我的问题和谈话不理不睬。我一直讲个不停，讲故事，问这个问那个，尝试跟把耳朵和口都封到密密的辜加兵开玩笑。我还是感到满意，至少可以跟又聋又哑的对象谈话。

这就是我首五、六个星期被单独监禁的经历。那是从来未曾梦想过的经历。踏入第二个月，盘问很少了。经过第一轮的震撼后，我也已经能够适应牢房的糟透情景。我也接受必须学习在石床上的粗纤维垫褥上的黑破床单上睡觉的事实。当我发现垫褥满是跳蚤，就让它立靠着墙，睡在石床上。每天晚上，我都跟跳蚤展开大战。久而久之，给蚤子咬到都麻木了。在囚房中，我分辨不出白天和黑夜。房间或许是用 5 瓦特的电灯泡照明，光度总是一样的。过后，我学习用运动的时间来估计时间，上午那段是八时至八时一刻，下午的是三时半至三时三刻。

过后不久，我也发觉同僚胡森-扎希汀其实是关在隔壁房。他完全不声不响。我还以为第十号房是空着的。我关在九号房；沙拉胡汀-高斯在八号房。还有一位朋友，《南洋商报》的傅超贤也关在“顶楼扣留中心”，但却不知道是哪一个房。陈蒙鹤也一样。那之后不久，胡森-扎希汀被移去樟宜监狱；傅超贤获释，后来成为李光耀总理的新闻官。

### 第31章 樟宜监狱

#### “E 座监房”

最后，经过三个半月的单独监禁，我也被送去樟宜监狱。一直以来，我只是从外头看樟宜监狱，看到的是那道又高又厚的墙。现在，我要成为里边的居民了。穿过了八道铁栅门，这儿拐那儿弯的，门开了又关，那沉重的敲击声几乎震破我的耳膜。最后，我来到称为“E 座监房”(E Hall)地带的大门。

门开了，我踏步进去，受到较早时送来“E 座监房”的同志的欢呼和欢迎。我抵达的那天，“E 座监房”已经住着七十多位政扣者，包括几位自 1956 年以来就被扣留的，其中有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和中学联领袖孙罗文。林福寿医生、马哈迪哇、甘绍仪、胡森-扎希汀、胡容芳和几位我忘了名字的职工会领袖，都是我的老相识。

那一大批政扣者认识我，主要是因为我是领导 1961 年《马来前锋报》工友罢工，而被东姑政权逐回新加坡的前《马来前锋报》编辑。他们也知道我跟他们的领袖来往甚密，在政治思想上属于同道，因此接受我为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E 座监房”的底楼有 20 间牢房，每间有一张床，抽水马桶，也有洗手和洗脸盆。楼上则是一个大礼堂。我住底楼 20 间房的其中一间。其余的扣留者住在楼上厅堂，每人一张床，像军营或病楼的摆列。在这里，扣留者可以自己煮食。所有煮食材料由营方供应，按照所选择的食物，包括中餐、马来餐和西餐。

西餐最为丰富，除了牛肉，每天一个人有四粒鸡蛋，还有牛油。中餐和马来餐都没有牛油和鸡蛋，而肉类也不是每天都有。我发现有超过一半的扣留者选择西餐。“E 座牢房”的确很特别，因为以前只是用来关白人罪犯。

第一天在“E 座监房”跟胡森、高斯、马哈迪哇、比尔列和几位选马来餐的华人扣留者一起吃饭，比起“顶楼扣留中心”真是差别很大，简直是天渊之别。我没想到胡森和高斯都是煮食能手。

与此同时，监狱外的政局风起云涌。人民行动党政府抓了百多位社阵、新加坡人民党、工团和南大等领袖后，开始忙着筹备大选。

在竞选宣传中，人民行动党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电台、电视、传媒，更动用了政治部警察来恐吓和威胁选民，阻止他们支持被人民行动党指为马共代理人的社阵和人民党候选人。选民害怕，人民行动党于是胜利了。社阵只取得 13 席，人民党惨败。

人民行动党是那麽的害怕社阵，两名中选的社阵议员巴尼和李思东被捕。另两位受通缉的侥幸逃脱，躲了起来。过后，几位落选的社阵候选人也被捕，他们包括陈仁贵和以社阵候选人（身份）参选的南大学生王发祥等。

选举那天，“E 座监房”充满着对选举成绩的猜测和预测。“E 座监房”的政扣者，绝大多数是活跃的政党或工团的干部。他们组成新加坡左翼的骨干，人民行动党对他们怕得要死。李光耀知道他们的才干。

人民行动党能在 1959 年大选中大胜，靠的是这批人，他们那时候支持人民行动党。如果不是因为这批人和他们的领袖，尤其是林清祥和方水双，人民行动党不可能胜利，甭说在 1959 年 6 月组织政府。如果那时没有这批人和林清祥，李光耀根本不可能当上总理。

他们预计和猜测社阵会胜利。他们深信大多数人民会支持社阵。他们有信心，在外头的领袖有能力汇集人民的力量来投票支持社阵。报章的竞选新闻，显示成千上万的人民涌向社阵主办的每一个群众大会，这已经足够证明社阵将取得胜利。他们期待着胜利和社阵在大选后组织政府。

我也跟大伙儿一样兴奋。我不想作出预测，但我真的希望社阵会胜利。因为我们将被释放，可以重新活跃政坛，为建立自由、公正和民主的民族和国家贡献力量。我们不要预测会失败。干嘛要预测会失败呢？因此，我们准备在“E 座监房”举行庆祝会，要准备吃大餐。

当大选成绩要开始公布时，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厅堂听新加坡电视台的大选成绩。可是，当一项又一项的成绩显示都是人民行动党胜利时，开始时那种高涨的希望逐渐冷却、冷却。

无论如何，当社阵候选人胜利时，大伙儿还是欢呼，只是，喊声越来越弱，因为胜利的席位比所预测的相差太远了。当最后一项成绩报告完毕时，社阵只赢得 13 席，礼堂是一片沉静，连稍稍耳语声都听不见。我们都发呆了好一阵子。在被叫到楼下吃夜宵时（已经是准备了很多食物的），很少人有胃口吃了。大伙儿都直接上床睡觉。

第二天的一整天，“E 座监房”的气氛一直很沉。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这项失败。大家开始提出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玩臭。悲伤化成了愤怒。林福寿医生跟另外几个人觉得有必要开会讨论大选成绩，以尝试了解情况。所有的人都失望，但成绩已经是事实。那天下午，我们再次在厅堂集合。

林福寿和另两三个人先讲话，尝试解释他们认为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一致指人民行动党玩臭，用肮脏的手段恐吓选民。然后，林福寿医生请我发表一些看法。

我还记得，我说人民行动党确实是经常玩臭，它的政治从来未曾干净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在大选前被关起来”。李光耀知道，如果我们都不被捕，“人民行动党根本就不可能赢。”威胁和恐吓选民也是人民行动党所干的勾当。人民因此害怕把票投给社阵候选人。然后，我吁请他们不要绝望。我请他们大家继续奋斗，不要灰心，不要举手投降。只要维持这样的战斗精神，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

几天之后，“E 座监房”的牢民增加了。落选的社阵候选人，包括王发祥，和其他约 40 位南大学生在残暴的“维护内部治安法令”下被捕。其中的一些，包括林源德和王发祥进来“E 座监房”。

与此同时，几位旧扣留者如孙罗文已经获释。但是“E 座监房”早已爆满了。但是人民行动党政权显然要逮捕和扣留更多的政治对手。于是，他们在樟宜监狱内再建一座扣留营。

我们过后被搬去那新建成的“E 座牢舍”（E Dormitory），由三座长形牢舍组成，内各设 20 间有门的牢房。那之后不久，来了另一批新扣留者，包括了一位社阵领袖谢太宝。

学习华语

（此节略）

思想意识的论争

（此节略）

## 第32章 隔墙传话

1971 年，我再度调回“顶楼扣留中心”去，开始新一轮的单独监禁和精神折磨。这已经是残暴的人民行动党政权第三度以惨无人道的手法对付我。当我从樟宜“中等监视扣留营”（Medium Security Prison, MSP）搬回扣留中心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应该预期到有什么后果了。

这地方没什么新的东西，只有辜加狱卒是新的。那位曾经教我几句辜加话的好心狱卒，并不在两个七人站岗组之中。我相当失望，但也是几天而已，因为，在新的狱卒中，我很快就跟其中一位二十出头的辜加狱卒建立起友谊。

## 学习跟战友通讯

这一回，我也还是学到了新东西，那就是怎么样跟隔邻和对面的8，9，10和11号房的扣留者通讯。我关在6号牢房，同排的是4，5和7号房。比起第一次关在这里，现在的牢房好一些，因为新牢房的光线较亮，有厕所和洗脸盆。两排牢房隔着一条小巷，一端连接守卫室，另一端连接着审问室。

这一回在“顶楼扣留中心”的第一晚，获知我隔邻的两个房关着两位女扣留者。我获知这项信息的情形是：当天下午六时，我到建筑物尾端，即4号房过后的浴室洗下午澡。我感到惊异，因为看到水喉头下端壁上有几个用黑炭写的华文名字。在名字上端，则是写着：“欢迎你，同志！”，跟着是很简短的便条。

我很轻易读出墙上的名字和便条内容。那两位女扣留者是在几个星期前从樟宜监狱调来“顶楼扣留中心”。我受促涂掉她们的名字，然后用藏在浴室内墙角一个小洞内的小火炭写下我的姓名。我很快照做，写上我的中文名。我其实也很担心过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运气差，被狱方知道这件事，就肯定会被调去前座的牢房。幸好没有一位辜加守卫是懂华文的。

第二天洗澡时间，我发现同一片墙上出现了新的指示。难友要我在墙角的那个小洞找东西，我照做，找到一小摺用塑胶纸包着的小纸。在成功取出小纸后，感到很满意。我赶忙擦掉墙上的字，匆匆冲了凉，然后赶着回牢房。辜加狱卒问我怎么今天冲凉这么快。我假装发抖，一面说：“很冷，很冷！”他笑了。我赶紧走回牢房，在辜加狱卒关上门后松了一口气。

## 浴室便条

吃过晚餐，我小心翼翼打开小纸条，读着用中文写的内容。

“赛同志，”便笺开始写道，“很高兴能够认识你。我和隔壁房的另一位战友不久后要回中国去了。回到那里，我们希望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出贡献。因此，在此期间，让我们更好的互相了解，通讯方法如下：躺近墙壁，用牙刷对墙轻击。字母‘a’敲一下，‘b’两下，‘c’三下，‘d’四下，以此类推。我们就用简单的英文。开始通讯，我会敲三下，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回话，就回敲三下。”

读完字条，我无法控制不安的感觉。我佩服隔壁房战友的创意。我奇怪她是从哪里找到那块火炭和怎么想到她所建议的那套通讯方法。同时，我也对于跟她联系感到迟疑和担心。在那样的情况下，她却那么热切的要跟我联系，用意使我大惑不解。

她们并不是首批自愿选择回去中国的政扣者。我们政扣者多数不同意，更不鼓励扣留者接受政治部遣送回中国的献议。我觉得，我们的祖国是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因此，我们的献身，虽然只是很小，应该是投身入建设一个民主和独立的马来亚。因此，至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斗争和牺牲都必须以马来亚为先。只是，却有一小批扣留者，像我们隔壁的两位战友一样选择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大路。另有一大批则被强迫遣送回中国，因为他们不是马来亚国民。

我们曾经严肃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却记不起我们是否曾经作出最后的结论。但在原则上，我们不同意和不鼓励扣留者接受被“放逐”回中国。我本身则从更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

题。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一项关于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我们对这个主义的信仰、奉献和献身，以及这个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马来亚的发展取向。我怀疑那些选择这条道路和这个主义的人，是否是真正了解他们所做的种种意义和影响。

他们可能在群众之间，造成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或者，有人认为，在新加坡面对着无限期的扣留，而扣留者的待遇则是一年比一年残酷，回中国或是解脱之路。因为，无条件获释的机会渺茫，甚至是完全没有。于是，有人就像我隔邻的两位战友，选择了更容易的出路：回中国，或多或少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用意虽好，方法却错了。

我认识几位跟我在 1963 年 2 月 2 日同一天早上被捕的女扣留者，包括陈蒙鹤，著名左翼活跃分子及我好友陈成发博士的妻子；曾梅蓉，工会领袖，获释后跟新加坡大学学生领袖黄金宝博士结婚；黄翠云，工会领袖，1968 年释放后跟林清祥结婚；及陈丽英，工会领袖，过后跟方水双结婚。其中我认识的几位，当时还在扣留中，但我并不认识住在隔邻的两位，因为她们是在过后几年才被捕的。

### 隔墙通话

由于很想了解情况，我于是同意跟隔邻的战友隔墙“对话”。收到字条的第二晚，我准备好牙刷，等待隔邻牢房的讯号。时间好像是过了几个小时，我最后才听到对墙传来三响击墙声，三秒钟后又重复。我回敲三下，然后开始长达数小时的艰辛“对话”，开始只是互相问好和互问健康状况，然后才继续谈政治。试想想，单单一句“很高兴能认识你”得敲 279 下。“你好吗？”是 141 下。然后，你得全神贯注地听，以便能算敲击的次数，对应每个字母，后组成词句。试想想你得听数千击响以听清楚对谈。例如：“对于你在反对李光耀——拉曼帝国主义政权斗争中的坚强斗志和牺牲，我向你致敬。”另敲数百下以传达毛语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社会主义万岁，马来亚人民万岁！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跑腿——拉曼和李光耀！”

我感到轻松，因为两位女扣留者几天后就调离扣留中心。我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离开，因为刚好被带到楼台上晨运。那天下午冲凉时，墙上写着要我在同样地方找纸条。那是告别便条，是写给“赛同志”的，然后是鼓舞我“坚定立场，续为人民而斗争”的语句，以及更多的毛语录，其中一些是我蛮喜欢的。

12 年之后，在 1983 年，我以香港道琼斯公司和新加坡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英文《亚洲研究杂志》(Asia Research Bulletin)编辑的身份访问香港，获知那两位女邻居是身在香港。她们抵达中国后，基于大家都不愿意谈的原因设法离开中国到香港。戴渊，选择被遣回英国殖民地香港，而不是回中国的前扣留者，在我访问时设晚餐招待我。

在晚宴上，碰到好几位离开中国到香港来的前政扣者。有十多个人出席晚宴，大家都开心地回忆着在樟宜监狱被扣留的日子。我偶然问起我的两位邻居。在被告知她们结婚，生儿育女过着幸福生活后，感觉很开心。如果有机会跟她们及家人碰面，谈起当年扣留中心单独监禁的经历，或许应该是更开心的事。晚宴那晚，我问起怎么样能联络到他们，却被告知由于时间太过短促，要联络相当困难。

### 第33章 多格劳斯-海德

#### 在中等监视扣留营

中等监视监狱的范围相当于五个足球场大，周围就只用篱笆网围起来。在这儿，刑事罪犯关在几座单层建筑屋内。政治扣留者则关在其中一个角落的小建筑物中，靠近主要办公楼。扣留者称这儿为扣留营。这座小建筑物可容纳约 20 人，但是，据我所知，它从不曾同一个时候关着超过 10 位扣留者。在这个扣留营，政扣者可自己煮食，包括早、午和晚餐，煮食材料每天由营房供应。

经过五年被扣留在樟宜监狱，三度在中央警署的“顶楼扣留中心”单独监禁之后，现在是被送来“中等监视扣留营”。

我很高兴发现，扣留者当中，有一位我所认识的战友热烈欢迎我这位新客。他是傅树楷医生，在 1963 年 2 月 2 日被捕前，他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家庭医生。过后我了解到，傅树楷不只是医生，而且是已经成了营内的厨师和种菜专家。

有一天，早餐过后，我跟傅树楷医生、汪永祥、吴静明和刘文霖一起看《海峡时报》、《每日新闻》、《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报纸，一位狱卒进营来，叫我准备好去“面试”。通常，像这类的“面试”意味着国内安全局有重要的东西要向某个扣留者查问。自调来这儿两年后，我已经有多次的这类“面试”。只是，这一回的“面试”却比较特别。面试本身无关紧要，但却很特别，因为，到来面试我的是一位“洋大佬”。

反共心理专家的面试

在这之前，我的案件的面试和盘问都是由一位国内安全局的华人高级官员处理。但是，那天我踏入审问室时，看到的却是一位英国人。看到我走进来，他站起来，笑着伸手跟我握手，但没有表明他的身份。

我跟他握手，问道：“你是谁？”

“哦！我是多格劳斯-海德(Douglas Hyde)。赛，近况如何？好吗？”

“多格劳斯-海德？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来看看你。”

“为什么？”我问他。我听过多格劳斯-海德这个名字。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做出这么样的反应，或许在他心里是在骂我讲出没礼貌的话。无论如何，他始终保持冷静。

自从离开英国共产党和被褫夺《工人日报》的总编辑职位后，多格劳斯-海德这位年纪已经相当大、和蔼可亲的老者开始投身新的领域，成为反共和心理战专家。他是在替好几个反共的亚洲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府工作和服务。我听说他被东姑和李光耀政权所雇用。

可是，那一天，在“中等监视扣留营”，多格劳斯-海德有一件任务要完成。所以，他控制着他的情绪，就算是被骂，被冷嘲热讽，也要忍气吞声，保持冷静。保持着笑脸，多格拉斯-

海德请我坐下。一位官差捧来两杯奶茶，放在桌上，一杯在他面前，一杯在我面前。

“赛，你喝茶吗？”多格拉斯-海德很有礼貌地请我喝茶。

“如果可以的话，我比较喜欢咖啡。”我回答。

多格拉斯-海德重新叫那位官差进来，要他给我换成咖啡。那位卷着头巾的印裔官差用奇怪的眼色看我，然后捧起那杯茶。他一面向着我眨眼，一面走出去。他知道我是很喜欢喝茶的，因为，在我被其他内安局高官“面试”时，大多数是由他招待饮品的。几分钟后，他捧着杯热咖啡进来。

“谢谢。”我微笑着对印裔官差说。然后，我转向多格拉斯-海德，“海德先生，你干嘛到这儿来看我？”

“赛，近况可好？好吗？”他重复较早时我故意拒绝回应的问候。

“我很好。谢谢。海德先生，你怎样呢？”我反问他，这回是带着笑容。

“我也很好。谢谢。赛。”他高兴地回答。多格拉斯-海德不习惯从他要“面试”的“共产党人”得到这么热情的问候。他告诉我说他所会见的共产党人中，从来没有一个向他问好，从来就不热情融洽，特别是在开始阶段。

多格拉斯-海德在新加坡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他在此之前是在马来西亚。他在这一带执行任务一年左右。在新加坡，多格拉斯-海德已经会见相当多名被政府套上红帽子，指为是“地下活动”重要人物和马来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扣留者。起初，内安局会鉴定那些政扣者需要由这位前英共份子来“洗脑”。接着，就一把有关政扣者送到特别扣留所，方便多格拉斯-海德进行“思想清洗”的任务，那就是连串旨在协助扣留者丢掉“共产思想”和“共产活动”的说项。

开始时看来相当担心的多格拉斯-海德，现在看来比较轻松了，时时露出笑容。

“赛，这儿的生活怎么样？”他问。

“你问监牢的生活怎么样？这可就很难说了。你得自己来住住，才能了解滋味，……”我说。

多格拉斯-海德把身子移前靠近桌子，把两只手放在桌面上，说：“可赛你看来还是很健康，神色焕发和兴高采烈，……，你还能开心地笑……。”

“如果只是因为被扣留，我不曾哭过，也绝不会为此而哭。”我说。

多格拉斯-海德的用意

多格拉斯-海德开始解释他那天到来见我的用意。他讲述他身为共产党人和担任《伦敦工人日报》总编辑时的生活故事，直到他最后是如何因为对共产主义绝望而离开。然后，他劝我



即刻当机立断，放弃共产主义。他也同样劝告过林清祥和林福坤。福坤是我的好友林福寿的弟弟。

然后，他谈起他跟我两个人作为报人和编辑的生涯和事业。他还说他和我都是因为政治理想而失掉工作。但是，我要回头还不会太迟，多格劳斯-海德是那麼认真的忠告我。

一如所料，这位前英共份子并不热衷于跟我讨论我所提出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课题。我不想浪费时间，跟他讨论和争辩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我郑重地告诉多格拉斯-海德，我根本没有什么思想意识必须“丢弃”，而我是在无理的情况下被扣留和囚禁，政府虚构罪名，对我做出充满恶意的虚假指控。我和多格劳斯-海德之间的对话也就结束了。

“你说我是共产党人，只因为是你相信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权的说法。我不是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曾成为共产党员。我有什么样的共产主义要放弃？我要求无条件释放或在公开法庭审讯我。”多格劳斯-海德仔细听着我的讲话。他句话不说，而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做。

再经过一些意见的交流后，多格劳斯-海德从椅子站起来，再度跟我握手。开始时他不说什么，但后来却带着迟疑地问我有什么要求。

“赛，你要提出什么要求呢？”

“有的，叫他们无条件释放我。”我回答。

多格拉斯-海德最后一次对我笑笑，慢慢放开我的手，挥手跟我说再见。

### 第34章 库德曼爵士的信函

年复年的继续扣留

1968年，在中央警署顶楼扣留中心单独监禁约四个月後，我被移去“中等监视扣留营”，这是开放概念的监狱，犯人可在没有围墙的监狱范围内四处走动。“中等监视扣留营”的其中的一个角落用来囚禁一小批政治扣留者。

抵达“中等监视扣留营”时，我受到傅树楷医生和四、五位未认识的扣留者迎接。那是我们双双被扣留长达五年以来，第一次见到傅树楷。由于是开放式，我们在“中等监视扣留营”可在本区内自由走动。我们跟刑事犯的区，只是以篱笆和岗站分隔。我们一起睡在大厅，可以自己煮食，可以种花种菜，养鱼和养鸽子。

对于刚从四个月单独监禁出来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它甚至是比我第一次单独监禁后，被移到樟宜“E座监房”时的变化还大。

时间继续前移，我的扣留继续延长，两年又两年。虽然新扣留营提供比较舒适一点的生活，监牢纪律有些放松和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可是，监牢终归还是监牢。白天，我们像同一个大家庭的兄弟一样，谈天，游戏，讨论和玩笑。但是，这样的时间有限，过得也非常快。白天好像很短，太阳公公似乎是急着要在天空中消失。我们都曾经在叹息：白天可是那么的短暂啊！

一到晚上，我们就跳入各自的天地。我们钻入各自床位的蚊帐内。躺着望蚊帐顶，偶尔看见一、两只蚊子在蚊帐内，在找吃。当大厅灯熄时，黑暗中忽然感到孤单寂寞，思念的情怀开始扑来。脑海中想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或是家中的妻子儿女，或是情人良伴，或是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别离了那么久啊！最难过的是如果眼睛拒绝盖上。像这样的夜晚，往往是无尽头的漫漫长夜！

这个时候，监狱当局正忙着建筑专用来关政治扣留者的新监狱：明月湾扣留营。1970年5月4日，全体政扣者都调往这个新的扣留营。

### 库德曼爵士的信函

1978年8月初，一位内安局的高官忽然来见我，他交给我一封志明由新加坡总理署转交的信。由总理机要秘书长林祥源签署的简短信函只有两行字：“库德曼爵士要求转交所附的函件予阁下。”

库德曼爵士（Lord Goodman）是当时英国牛津大学的院士。我当然不认识他。因此，收到他的信感到奇怪，更怪的是他不是把信直接寄到樟宜监牢给我，而是寄到总理署去。我只能假设，那封给我的信是先寄去总理署照会李光耀的。

库德曼爵士在那封信中写道，国际笔会（国际诗人、剧作家、编辑人、散文家和小说家协会）要求他联络李光耀，提出我在新加坡继续被扣留的问题。库德曼解释说，只是因为我“refused to renounce violence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拒绝放弃以暴力作为政治工具”）。

如果是真的，库德曼爵士继续写道，他要劝我能重新考虑李光耀总理所提出的“拒绝放弃以暴力作为政治工具”的立场。很显然的是，当库德曼爵士写信给李光耀和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告诉他关于我被扣留超过十六年的真正实况。

当库德曼爵士给我忠告时，我一点也不怀疑他是出自善意、真挚和诚意。因此，我相信当他知道我在李光耀政权被捕及扣留那么久的真正情况之后，一定会同意我的立场。

我从未被指运用暴力作为政治工具，也没有计划要通过暴力来达致政治目标。在组成扣留我的理由的控状中，根本就没有哪一条说我曾经在政治上使用暴力。我被扣留这么久以来，“放弃暴力”从来都不曾成为释放我的条件。

为什么等到1978年，李光耀才说我拒绝放弃暴力？好心的库德曼爵士如果无法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情有可原，而李光耀则绝不可能诚实和清楚地作出回答，因为他已经用那么残暴的手段对付我，以及新加坡许多跟我一样命运的政治扣留者。

我不相信如果我写回信去一五一十地说明有关我被逮捕及扣留有关的实况，而那封信会到达库德曼爵士手中。因此，我只是写两句话向林祥源致谢，核实已经收到库德曼爵士的信函。

库德曼爵士信函的故事就这样结束。我没有复信，内安局官员也没来问起。我只是在那封

库德曼爵士的来信上写下记录：“对不起，亲爱的库德曼爵士，没有回复你。”

### 第35章 放逐乌敏岛

“想吃什么？”

收到库德曼爵士的信之后约两个月，我意外地被调往惠德里路的秘密扣留中心。一、两天后，我获知林福寿也调来这儿，但在不同座。

自从被扣留将近十六年以来，在新扣留中心的第一天，看管扣留所的狱卒破天荒第一次问我：“午餐想吃什么？”

我吃惊，假装没听见，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是，那位狱卒重复他的问题：“赛先生想吃什么，说啦，鸡饭，还是伯拉尼饭、海南面或是炒面，我去买。”

最后，我说：“好啦，给我海南面。”他又问要喝什么？奶茶、咖啡，还是甘蔗水？我要甘蔗水。感觉上，好像是在做梦。

吃午餐时，我尝试想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我预算着离开明月湾后会再一次送去单独监禁，因为一般上，“顽固和死硬头脑”的份子要一次又一次地塞进单人房去监禁，以进行精神折磨。我已经经过四次的类似折磨。我的这个新牢房不属于单独监禁，虽然墙很高，却有睡床、厕所和浴室。睡床前，有相当大的范围可运动，铺水泥，很干净。

然后，我尝试对库德曼爵士通过总理署寄给我的神秘函件寻求答案。看来，总理署已经成了牛津大学校长的“邮箱”。

最后，是关于食物。看管我的那位狱卒在第一天跟我提起的每一种食物，我一样样都尝过了。第一天尝过海南面后，第二天我要海南白斩鸡饭，下来要伯拉尼饭、炒面，好像很馋嘴了。当我向莎拉玛讲起食物的改变时，她以为我在幻想。那天，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扣留所，她刚巧带来在樟宜路大兀餐馆买的伯拉尼饭。莎拉玛在我告诉她不用再带食物给我后，才相信我告诉她的话。

所有这一切，似乎在我进来这儿三星期后的某个早上获得了答案。我突然间被通知收拾所有的私人物件，准备离开秘密扣留所。又要离开？我心里想，到底去哪里呢？约一小时后，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来了。

“准备好了吗？”他问。

“到哪里去？”我反问。

“到时你就知道啦！”南里警长回答。

## 放逐乌敏岛

南里警长驾驶的车子往牙笼路的方向去，接着进入樟宜岛和樟宜路上段。哦，看来是回去明月湾，我心里想，但却默不出声。车子在樟宜路上段奔驰。靠近樟宜监狱时，我等着他把车子转进监狱范围的路段，但南里警长却直接驶向樟宜尾。这回，我真的迷惑了。

“我们到底去哪里？”我问。

“我们到乌敏岛野餐去。”

“野餐？”

“是的，你可以就住在乌敏岛。”南里笑着说。

我以为南里警长只是讲笑。他只是要在送我去明月湾前带我兜兜风。

但是，他把车子停在樟宜尾。在樟宜尾码头，我看见一艘载客渡船等着我们来。沙阿利警曹协助把东西搬上船，然后，南里警长领我上那艘在海浪中摇晃的船。我就坐在他旁边。那艘至少可以载 30 个人的渡船，今天就只有我们三位乘客：南里警长，沙阿利警曹和我。

我好像还是在梦中，虽然已经从五官感觉出自己是在一艘船上，身旁是坐着南里警长。海水的水花轻溅到我的手和脸，船的引擎声和海浪声在耳边响着。所有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它，因为下来所真正发生的事，在我心中从来就未曾想象过。

我们启航约十分钟，当船正在樟宜尾和乌敏岛之间的海域上时，南里警长才开口说话。他说，从今天起，我在“中止扣留令”下限居在乌敏岛。过后，我获知，林福寿医生在同一天也被带离惠德里秘密扣留所，被带去樟宜尾码头，搭渡船到大德光岛去。我们各被“奖赏”一个岛，按照我的好友乌斯曼-阿旺的说法，李光耀已委任我为乌敏岛岛主。

从那一天起，就正如新加坡《海峡时报》的社论所指出的，我开始像拿破仑一样开始政治放逐的日子。

## 政治流放者

三个月之前，南里警长和其他几位内安局官员已经查过这个乌敏岛，以确保它适合作为政治流放的用途，尤其是从保安的角度。在确定适合后，他们买下一间岛上老居民所拥有的小破屋，进行改装。原本是亚答顶的板屋，改成半砖半板墙，亚答屋顶换成锌片，盖上天花板。我的这间新房子有一个睡房，够放四人沙发的小客厅，另外是厨房加厕所加饭厅。

那就是我在乌敏岛的新“岛主屋”。南里警长把我带到这间屋子来，那是他在离此不远的乌敏岛警亭把“终止扣留令”交给我之后。根据其中的命令，我必须住在乌敏岛 32 区，第 98 地段，门牌 484 号的屋子。没有内安局总监的批准，不得搬离该屋子。

事实是，我只是从小监牢搬到大监牢。以前是关在樟宜监牢，现在整个乌敏岛是我的牢房。我的地位还是政治扣留者，还是不自由，我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归还给我。

正当我检查和看看新居的四周时，一辆“德士”到屋子旁停下。我惊异地看到妻子和儿女们，罗斯曼、丽丝玛瓦蒂和诺玲达从沙阿利警曹驾驶的“德士”下车。他们冲进屋子，我们拥抱在一块。我感到似乎在梦中。

我以奇异的心情看着莎拉玛和儿女们，似乎不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孩子。我似乎不要接受这个生活的现实。我所想像中，孩子们都还很小：我被捕时，罗斯曼六岁，丽丝玛瓦蒂五岁。当时才三岁的诺尔曼没跟他们一起来，因为跟着他阿姨住在半岛。那是诺玲达吗？我开始时心里一直在问我抱着吻着她的秀发的少女是谁。当诺玲达用华语跟我交谈时，我感到惊喜，她还在中华女中念高中。

“那‘德士’司机不收车资。”莎拉玛说。站在我旁边的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听到，笑了。我大声笑。当我把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介绍给家人后，莎拉玛即刻道歉。

其实，在乌敏岛哪会有德士。但是，当他们抵达乌敏岛码头时，已经有一辆不能再用来载客的德士停在那儿等候。司机请他们上车，直接送到我的新家来。南里和沙阿利过后表示要离开，我跟他们握手，并表示谢意。

就剩下我们一家留在屋子里。莎拉玛带来中餐和糕点，罐装和盒装饮料，等等。他们在厨房忙着，准备午餐。我叫诺玲达跟我巡视屋子的四周。家人只能在周末才能来这儿跟我一起住，因为诺玲达还在念书，而妻则还在经营承办宴会伙食生意，罗斯曼和丽丝玛瓦蒂则从旁协助。

从那一天起，我在离新加坡本岛不远的小岛开始作为政治流放者的新生活。一心一意要我在“监牢中烂掉”的李光耀政权，一直不间断地进行报复性迫害。我发誓绝不要满足他们想看着我在“监牢中烂掉”的美梦，不管是在樟宜监狱或是在乌敏岛“大牢房”。我做好准备长期住下来，按照争取真理、公正和民主斗争的需要，需要住多久就住多久。李光耀和他的监牢，管是什么样子或是在哪里，都不会叫我“烂在里头”。我发誓。

在乌敏岛上，国际特赦机构的代表来探访我。我也同时被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的“国际笔会”委任为终身会员或荣誉会员。在乌敏岛上首几个月，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很多访客，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外国。

乌敏岛本岛的华、巫居民，开始时对我敬而远之，渐渐也开始跟我熟络了。有些居民到我家拜访，带来各种土产，或是所种的青菜，或家鸡所下的蛋，或果园中的水果。他们的孩子，在我读书写作时到我家来“捣蛋”，帮忙我种花草种菜和收拾屋子。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在（乌敏岛）监牢中烂掉”。

在岛上的第一个斋戒月前夕，我跟几位马来邻居筹备在整个斋戒月期间举行诵经会。居民的反应热烈。每晚都有十至十五位男、女岛民来诵经。

斋戒月前夕获释

我已经准备好跟乌敏岛上的伊斯兰邻居一起欢庆开斋节。但阿拉真主却另作了安排。斋戒月第廿七晚，我们举行诵经完结仪式。第二天，南里警长和沙阿利警曹忽然出现。我以为他们是进行每一至两周至少一次的例常探访。但是那天早上，南里警长又叫我搬家。“这是最后一次了。赛，你今天被释放了。来，让我送你回去新加坡本岛去。”南里警长说。

我呆了一阵子。“今天吗？”我问，似乎不敢相信所听到的一切。“对，就是今天，现在马上就走，因为你的家人在等着。”

我赶到一、两家邻居去，告诉他们最新消息。他们都感到意外，但都表示感谢上苍，因为最后我终于被释放，自由了。

## 追溯往事

1963年2月2日，斋戒月的一个清晨，约凌晨四点半，年方27岁，正值怀孕六个月的爱妻莎拉玛跟我说珍重。刚年满34岁的我被哈欣副警监带走，他是在“保护公共秩序安全法令”下逮捕我，把我丢进李光耀政权的监牢中。

1979年8月22日，也是斋戒月，爱妻莎拉玛已经四十多岁了，而她所怀的胎儿，诺玲达，现在已经是16岁多了。罗斯曼已经23岁，丽丝玛瓦蒂22岁。他们在樟宜路上段租下的1065号屋子迎接我从同一个李光耀政权的监牢中回到家里。跟着他阿姨住的诺尔曼（20岁），当时正在伦敦念书。

我的年纪已经是51岁了。那位抓我的哈欣副总警监已经是身归故土。我是由南里警长沙阿利警曹带回家的。

我释放后两年，在1963年我被捕时才六岁的大儿子罗斯曼跟他自由恋爱的对象莎丽法-阿丝玛结婚。罗斯曼本来在吉隆坡一家私人学院念法律，唯却被迫半途停学，因为得回新加坡协助母亲打理承办宴席餐食的生意。过后，他在新加坡从事酒店和餐馆业多年，过后到马来西亚从事相同的生意。

我的长孙，罗斯曼的孩子在1982年12月10日出生，名叫思琳，第二个孩子莎乌娜则约一年半后出世。

在我坐牢期间，二女儿丽丝玛瓦蒂最勤给我写信。她在1985年在吉隆坡跟洛克曼-哈京结婚。丽丝玛瓦蒂婚前在新加坡一家日本电子厂当品质控制员。

诺尔曼由她的阿姨莎丽娅和姨丈拉惹-阿末-诺汀医生（现在是丹斯里-拿督斯里）送出国留学，起初在英国，后来到美国。

最小的女儿诺玲达，那位在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幼儿园受教育时学习射下美帝飞机的小妮子，则在1989年5月嫁给莫哈默德-阿兹米-拿督-阿都-华哈。阿兹米是美国毕业的电子工程师。这个小女儿，我们一家都叫她为玲达，她在新加坡中华女中高中毕业后，选择在新加坡从事服装设计。

当我在 1999 年 5 月 18 日庆祝 71 岁生日时，已经有了十多个男、女孙儿。感谢上苍！

（第一部分完，节录自 2001 年正月出版的《人间正道》中文本“第四部：囹圄篇 十七载漫漫长夜”）

张泰永节录

一位马来进步新闻工作者对李光耀的控诉（续）

——节录自赛-扎哈利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和《万千梦魇》

编者按：赛-扎哈利(Said Zahari)出生于 1928 年 5 月 18 日英国人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二战后求学时期即受到马来亚和印尼的反殖民族主义者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关注争取国家独立的政治风云。

1951 年起投身报界，在英国人视为肉中刺的《马来前锋报》工作。1960 年代，由于他跟新加坡人民党的领袖以及其他进步工团和大学学生会的领袖关系密切，并且一再拒绝李光耀对他的“关怀照顾”，令李光耀恼羞成怒，于是，他便在李光耀政权于 1963 年 2 月 2 日发动的一次所谓“冷藏行动”的大逮捕中逮捕。从此，他就在共产党、亲共和马来沙文主义分子等莫须有罪名下，不经审讯地被关押和拘留至 1979 年底。前后时间长达十七年。在这十七年当中，赛-扎哈利与李光耀反共反民主的野蛮行径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誓不低头。最后，李光耀无计可施，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把他释放。

赛-扎哈利 1989 年底得到时任马来西亚首相兼内政部长的马哈迪医生的批准，允许他以永久居民的身份在马来西亚定居，使他感受到重新回到马来西亚居住后，不仅给自己开拓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而且可以开始呼吸到远比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新加坡岛“新鲜和清新的政治空气”。1996 年-1999 年，他荣任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传播系客卿作家。2001 年 5 月荣获“2001 年报业自由奖”。2003 年底接受国内安全局网页《马来西亚公报》邀请，担任常驻作者。

赛-扎哈利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帝反殖斗士，也是一位在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他在被李光耀政权逮捕之前，就已是马来马来记者协会会长。除了马来文，他还精通英文，懂华文。在文学方面，他也很有才华，擅长于写诗、著述和翻译。他对中国文学甚感兴趣，特别是对鲁迅的杂文和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在饱尝李光耀政权的“铁窗风味”期间，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极其恶劣条件下，向华族难友努力刻苦学习华文的同时，曾把鲁迅的一些著作翻译成马来文。

1997 年 10 月，赛-扎哈利夫妇首次访问了神往已久的中国，东道主把夫妇俩带到历史性的天安门广场。赛-扎哈利后来在其《人间正道》回忆录里提及这件事时，情不自禁地写道：“……像其他游客一样拍照留念之后，我站在一个角落，观赏宏伟的天安门广场。我似乎听到人民在听到毛泽东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大革命胜利后发出的如雷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时刻，我心目中看到毛主席威武地站着，周围是其他的革命领导，他们在站台上挥手，迎接他们民族伟大胜利的呼声。……我激赏毛泽东的才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最后解放了中国人民……”。

迄今为止，赛-扎哈利前后写了两本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马来文名“Meliti Lautan Bergelora”）和《万千梦魇》（马来文名“Dalam Ribuan Mimpi Gelisah”），控诉英帝国主义和李光耀野蛮残酷镇压和迫害反帝反殖人士的累累罪行，书中所记录的内容，都是作者以及其他被迫害者的亲身经历。这两本书由吉隆坡“朝花企业”出版，赖顺吉翻译。

以下是节录自两本回忆录里的有关内容，以飨读者：

## （二）

### 第一章 新加坡上空乌云密布

作为这一部回忆录（《万千梦魇》）的开头，我要先讲讲新加坡和马来亚在1961年及1962年左右的政局。这些背景资料，对于读者理解李光耀的政治暴行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政治手段，最后造成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大逮捕，而我，就是被那一场大逮捕剥夺了长达十七年的自由。

1961年末及1962年初，新加坡的天空，乌云密布，黑雾重重笼罩。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官员，由东姑阿都拉曼首相领导的马来亚政府，以及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自治政府，连日不断地忙着开会。他们之间虽各怀鬼胎，却在最后关头连成一气，勾结起来，一起阴谋镇压及粉碎新、马两地的反对党。

他们的阴谋具有明显的反共和反民主色彩，也抗拒当时风起云涌的亚非拉精神：那个时候，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朝向民族解放，都致力于要摆脱西方——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及美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

领导亚非拉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包括印度的尼赫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越南的胡志明、缅甸的昂山、加纳的恩克鲁玛、肯尼亚的肯雅塔、埃及的纳赛尔、阿尔及利亚的阿巴斯、南非的曼德拉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8月15日结束后，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取得独立。有的殖民地是通过谈判，跟殖民地政权取得妥协而获得独立，有的则是像印尼和印度支那（越南）那样，通过武力和武装斗争，即发动民族解放战争，打败殖民者而取得独立。

人民斗争的怒火，要求祖国从西方殖民者的枷锁和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浪潮，已经阻挡不了了。旧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了。

在东南亚，印尼和印支三邦（越南、寮国和柬埔寨）人民拿起武器，分别赶走荷兰和法国殖民主义者。这两个殖民地宗主国，在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失败投降之后，还拼死拼活，千方百计要恢复对上述国家的殖民统治。

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则先后摆脱英国的枷锁。菲律宾则从美国统治下获得解放。当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之后，英国是唯一仅存的东南亚殖民地势力，还保留着新加坡、汶莱、砂拉越和北婆罗洲等殖民地。砂拉越和北婆罗洲是加里曼丹的一部分，由英国统治。其余的加里曼丹是印尼共和国的领土，印尼在1945年8月17日已经宣告独立。



英国的这些残余殖民地，从政治、经济和东南亚的英、美防务来说，都是战略重地，这已经延续好几十年了。上述殖民地是在英美霸权主义下维系着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美联盟所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在本区域所有国家取得独立之后，如何确保他们在东南亚的霸权得以继续维持。越南在赶走法国殖民者后，已经成为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尼共和国则致力于反殖和反帝事业。

印尼和越南两大共和国的领袖，胡志明和苏加诺，是当代著名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战士。曾经统治这个区域的前殖民地政权，还有在东南亚拥有利益的殖民主义势力，尤其是英、美，对于胡志明和苏加诺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因此，他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唯有保守、亲西方和反共的领袖才能够被允许在这些前殖民地，尤其是马来亚和新加坡，掌握统治权。当时，在东南亚最令他们头痛的是印尼共和国的领袖苏加诺总统。那是因为苏加诺的政治影响已经伸入马来亚、新加坡和汶莱，特别是在马来民族主义战士之间，他们把印尼视为政治力量的中心，能够领导南洋诸国摆脱已经经历了数百年西方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马、新、汶三地的反对党，从印尼解放斗争中的反殖反帝政治取得诸多启示。这种事态发展威胁到英殖民主义的利益，进而引起美国、澳洲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担忧。

#### 人民行动党危机四伏

新加坡的地位是自治邦，当时正在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展开重新谈判，以求在 1963 年提升至全面独立的地位。马来半岛（马来亚）则已经在 1957 年取得独立。确定新加坡独立地位的宪制谈判必须在 1963 年召开，那是由伦敦的英殖民地政府，跟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进行谈判。可是，1962 年的新加坡政局，却暴露出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领导已经摇摇欲坠。

人民行动党在 1954 年创党，在 1959 年 5 月举行的首次大选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主导着新加坡的政治。可是，在 1961 年 7 月中，该党已经分裂为二。其中一部分的资深领袖，因为不再信任李光耀的领导，离党而去，另立新党。他们认为，李光耀已经背叛人民行动党当初的反殖政治原则。

在此之前拥护民主和反殖的人民行动党，已经转变成跟随李光耀个人口味和个人政治调子的反民主和亲殖民地的政党。一位长久以来在新加坡工人和华文教育学生之间拥有巨大影响力，而且一直是人民行动党支柱的青年领袖，在 1961 年中领导这一批脱离人民行动党的人士。这位青年就是林清祥。

人民行动党的分裂，产生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这个新政党。社阵由退出人民行动党以组织新党的 13 名国会议员之一的李绍祖医生任主席，林清祥出任秘书长，而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前学生领袖傅树楷医生则出任副秘书长。

从创党开始，社阵即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劲敌。这种情形确立了新加坡领导权的政治竞争未来模式，在新加坡修订宪法以便在 1963 年举行大选之后，一直持续着。

社阵获得新加坡人民党和工人党的大力支持，地位日益成熟。人民党和工人党的党员和支持者虽不多，但一直以来都是进步的反对党。人民党是新加坡以马来人为基础的进步民族主义政党。当初，新加坡人民党是三个同源政党系列，即马来亚人民党、新加坡人民党和汶莱人民

党的成员之一。

这个新结盟的政治力量，使李光耀和英殖民者感到害怕。他们意识到，人民行动党的近半数领袖和党员跳槽到社阵，会随时使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陷入瘫痪。

英殖民主义者和李光耀认识到，随着政局的巨变，1963 年选举之后的新加坡领导，很大可能性会转入社阵及其盟友人民党手中。

这个可能性成了李光耀的恶梦，同时令英殖民者，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殖民势力大感担忧。于是，已经选择了李光耀为最适合照顾英、美新殖民主义利益的英殖民者，现在面对困境了。

社阵在大选中赢出的可能性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那是因为，如果社阵当权，英国在本区域的庞大政治和经济利益将失去保障，更不用说它在东南亚的防务利益和霸权了。

于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他们必须保住李光耀，以免他在大选之后被逐出新加坡的政治圈。必须保住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以免它被社阵及其盟友人民党所粉碎。

马来亚被拖下水

（此节略）

殖民主义者的阴谋

于是，在整个 1962 年中，李光耀、东姑和英殖民主义者都处于最忙碌的状态，忙着寻找如何扑灭他们在新加坡的反对者的共识。他们的目标是社阵、人民党、工团、新加坡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南洋大学学生会。

他们的根本共识是：反对党社阵和人民党的领袖，学生和工团领袖，以及政治活跃分子，凡是反对不纯正的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都要抓起来。所有反对者都将在保护公共安全法令(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PPSO)下被扣留。这项法令现在改称为内部安全法令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是继承自殖民主义者的残暴法令，至今还继续在新、马两地使用。

在抓人方面，他们有了一致的共识。可是，什么时候行动，抓些什么人，他们还互相争吵：李光耀要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由马来西亚政府抓人。李光耀要在抓人的问题上“洗清双手”。东姑所要的却刚好相反。东姑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跟马来亚合并之前，事先“清理”新加坡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分子”，然后才可以成立马来西亚。

东姑的意图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必须进行清理工作，在该岛抓“共产党和共产党分子”。要不，东姑将不会同意接受新加坡跟马来亚合并，进而成为马来西亚联合邦的一部分。

英殖民主义者则完全不介意逮捕要在成立马来西亚之前或之后进行。他们也不在意由谁来进行逮捕。对英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政敌必须抓起来，并在有关法令下加以扣留。唯有这样的行动，被认为是可以成功成立马来西亚，它的新殖民计划，同时也确保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利益。

在抓人的问题上，李光耀显然是最乱来的那位。伦敦憩幽园 (Kew) 殖民地档案局收藏的

机密文件，如今已经解禁，公众可以自由阅读，它暴露了新加坡总理在合并和成立大马问题上摇摇摆摆态度，特别是在逮捕他的政敌的问题上。

李光耀不只要抓社阵和人民党的领袖，而且还要抓王永元领导的联合人民党的几位领袖。他根本不管他们从未被指为亲共。联合人民党其实是一个反共政党。此外，李光耀也玩弄手段，要求东姑抓马来亚的两位社阵领袖，即阿末-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n）和林建寿。他们两人是马来亚国会的重要反对党领袖。东姑认为这要求不合理，坚决地拒绝李光耀的要求。（无论如何，阿末-布斯达曼最后还是被捕，那是在冷藏行动两个星期之后）。

由于担忧，李光耀怀疑东姑可能会在他把所有东姑称为“共产党和共产党分子”抓起来之后反悔，拒绝新加坡跟马来亚合并。李光耀就他的担忧向英国投诉。他告诉英国驻新加坡外交使节说他要向东姑讨一份白纸黑字的书面保证。他要东姑给他书面保证，在完成逮捕之后，肯定接受新、马合并及进一步成立马来西亚。

李光耀的要求被英国视为是过分的。他们认为，这个想法根本不会被马来亚首相所接受。李光耀的要求反而很可能会使东姑震怒，因为李光耀不信任他。

英国最后忠告李光耀放弃他的要求。虽然同意英国人提出的忠告，思路紊乱的李光耀还是担心。他害怕东姑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主意，在抓了新加坡反对党政敌之后，拒绝新、马合并。

李光耀的这种反反复复，使到原本要在 1962 年展开的冷藏行动，被迫拖延到 1963 年 2 月 2 日。

英国人确实非常了解李光耀的目中无人的高傲态度，经常看扁东姑和马来亚其他政治领袖的政治水平。英国人也知道李光耀的野心很大，要掌控马来西亚的政治。因此，他号称勇敢，其实却是一个怕事的懦夫。按照英国外交使节的说法，李光耀“可以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作出任何事情。”

尽管如此，英国人并没有改变主意。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英殖民地正处于关键时期，的确需要一个拥有近乎李光耀这样人格和品德的人来扮演维护及保障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权益，而恰好李光耀又的确准备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唯有通过这样的办法，他本身的政治议程的利益才会有保障，才可以加以实行，就如今天已获得证明那样。

最后，李光耀和英国人同意大逮捕在 1963 年 2 月 2 日，以臭名昭彰的冷藏行动的统一行动进行。在那项于斋戒日凌晨展开的秘密行动中，超过百名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反对党领袖、工团领袖、学生领袖、记者和政治活跃分子被逮捕。这项大逮捕同时使新加坡的活跃反对党政治运动陷入瘫痪，就如英殖民主义者所策划的政治议程所要达到的那样。

冷藏行动之后的六个月，在赢得 1963 年 9 月的大选后，李光耀突然宣布新加坡“独立”。那是在东姑在吉隆坡宣布马来西亚于 9 月 16 日成立之前几个小时作出的动作。

李光耀非常清楚他的那项没有实际意义的行动，从国际法来说根本就不合法。实际上，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地位是自治邦，而其总理根本没有权力作出那样的宣布。无论如何，李光耀满足了本身能够欺骗广大新加坡人民的自大狂，他似乎在说，在并入马来亚及成立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已经成了个独立的国家了。

英殖民者当局故意让李光耀作出那项没有实际意义的行动。英国人确实认识到那项新加坡

独立的“宣布”根本没有意义，从法律角度来说根本就不合法。无论如何，东姑首相则作出正式的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解释它对李光耀公开作出这项行动的立场。但是，为了顾全李光耀的面子，东姑同意接受英国政府会向李光耀提出抗议的书面保证。可惜的是，新加坡人民却继续被蒙骗，不知道新加坡宣布“独立”的真实故事。

## 新加坡被驱逐

无论如何，新加坡在 1965 年 8 月 9 日宣告真正独立。那是在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把新加坡从马来西亚驱逐出去的同一天和日期。

在那个历史时刻，东姑在马来西亚国会的紧急会议上，宣布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东姑的那项宣布震动甫刚成立两年的马来西亚。东姑领导的巫统起地震，几乎分裂。巫统的总秘书赛-查化-阿巴 (Syed Jaafar Abar)，在马来西亚成立后，是最大力反对李光耀政治的领袖，他即刻宣布辞职。赛-查化-阿巴明确发言反对东姑的行动，认为那是违反马来西亚的利益，尤其是巫统所代表的马来人的利益。

巫统的其他几位最高层领袖，包括联盟国会议员马哈迪医生，同意赛-查化-阿巴反对东姑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的方式。相反的，他们要求马来西亚在吉隆坡的中央政府，如果李光耀继续躲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幌子后面玩弄种族情绪，就采取坚决和激烈的行动，包括以破坏国内安全为理由，使用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和扣留李光耀。

赛-查化-阿巴这一派人也要求派出军警到新加坡，还宣称如果在逮捕李光耀之后爆发种族暴乱，就应履行马英防卫条约，以确保马来西亚的安全。

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成立仅仅一年多之后，马来西亚的确是站在十字街头，处身于一个团结和巩固地位的关键时刻。约一年后，随着人民行动党派人参加马来西亚第一届大选而几乎全部候选人都告败北之后，爆发了一项严重的危机。这项结果证明了李光耀不但不受到马来人的支持，而是连华人也唾弃它。为了赢得华人的选票，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进行攻击性的宣传，企图说服华人说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前途唯有在选举人民行动党人进入马来西亚国会方有保障。

李光耀企图成为马来西亚非马来族群，尤其是华人的英雄。他提出模糊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金玉其外而败絮其内。他强调马来西亚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各族权利不平等。李光耀也提出和夸大 1957 年马来西亚宪法经已阐明并在马来西亚宪法中继续保留的马来人的“特权”问题。李光耀完全知道马来人“特权”的存在，而他在谈判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合并，以及过后成立马来西亚时，根本就不曾提出任何异议。

相反的，在新马合并及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的一项公告中，李光耀郑重强调其立场，称他所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接受马来西亚宪法。他根本未曾针对宪法中列明的马来人“特权”提出任何问题。

那些誓言和保证就是由李光耀本身所毁的。李光耀的毁诺和伪善，导致东姑首相在后来把他形容为“不可以信赖之人”。

很不幸的是，对于东姑，对于巫统和对于马来西亚而言，东姑对李光耀人格和政治手段的认识来得是太迟了，就如生米已经煮成饭了。

马来西亚的“纽约”

.....

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之后，李光耀的角色及他领导下的新加坡的政治走向，全都是趋向达成英国的政治议程。这一点现在已获得明确的证明：新加坡在英、美的防务战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主动要成为美国领导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具。

如果东姑早些时候有寻求其看法和忠告，英国已经肯定会在东姑和李光耀之间指出一条妥协之路，在不必要驱逐新加坡或逮捕李光耀的情况下保住刚成立的马来西亚。可是，东姑早已做出最后决定，并立意不改变立场。赛-查化-阿巴辞掉巫统总秘书，他不屑一顾。在决定要驱逐新加坡时也不征求英国的意见和看法。

非常明显的是，东姑已经预计到英国肯定会通过施加各种政治压力，来阻止他这么做。东姑相信李光耀必然会向英国求救，不准东姑在事先未跟英国磋商下采取任何朝向驱逐新加坡的行动。

因此，在驱逐新加坡前夕举行的联盟（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晚宴上，东姑拒绝会见要求会见他的英国代表。对东姑来说，如果继续让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继续展开引起马来人怒意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运动，新、马必将爆发种族纠纷，特别是华巫纠纷。事实是，东姑的担忧并不一定会发生。那是因为并不是很多华人支持李光耀，新加坡如此，更不用说马来半岛。

#### 第四章 欧南监狱闹翻天

欧南监狱的确是历史悠长。几乎所有祖国的独立战士都曾经被英殖民主义者丢入这座监牢里，从日治时代以前的 1930 年代一直到 1940 年代中，然后在日据法西斯（1942-1945 年）时代，以及在 1945 年底当英殖民主义者再度回来统治新加坡和马来亚之后的时期。

其中，经常在报章及书籍中提到的欧南监狱牢民包括阿末-布斯达曼、伊萨-哈芝-穆哈默、布哈努汀医生，他们都是马来青年协会（Kesatuan Melayu Muda, KMM）的重要领袖，那是由依布拉欣-雅谷领导的激进马来民族组织。此外还有卡蒂嘉-西迪克、沙末-伊斯迈、墨兰-阿都拉及其他人。除了他们，还有众多马来亚共产党党员和支持者，及反殖的各民族工人领袖都曾经成为欧南监狱的牢民。

那天，1963 年 2 月 2 日，我是由哈欣警长带去欧南监狱的。进入它的大门之后，我们穿过几个小门，到达一个放着几张小桌子的地方。在这儿，狱差正忙着登记才要被关进监牢的新人。哈欣警长交了人就离开了。而我现在是交由监狱官差管了。我被指示站在一个角落以等待登记。

马来语言及文学爱好者：琳达-陈蒙鹤女士

当我在等待登记成为欧南监狱的新住客的时候，看见两位熟人：社阵副主席占姆斯-普都遮里和新加坡 1950 年代中著名的知识分子及左翼政治女活动家琳达-陈蒙鹤。

前天，我才在陈蒙鹤家里，跟她的先生陈承发博士一起喝茶。我跟蒙鹤和承发都很熟。

在冷藏行动前的好几个月里，我常常在新加坡大学的书店或食堂见到陈蒙鹤。我当时在新加坡大学上由格林教授讲课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在等着上课前，跟陈蒙鹤交谈。陈蒙鹤跟我同龄，我们都在 1928 年出世。她生于中国，一岁就跟家人移居新加坡。她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接受教育，直到大学。她精通华语、英语和马来语。她进修马来语文系，曾经编纂马来文-中文词典，并把中国的儿童文学和民间故事译成马来文。

在政治领域，蒙鹤活跃于妇女运动，曾经领导反黄运动，抗拒当时在新加坡横行的黄色文化。她活跃于争取人民基本权益的左翼运动，使她在 1956 年 9 月被英殖民主义者引用内部治安法令加以扣留，在两年之后有条件释放。

蒙鹤也活跃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并因此结识陈承发博士。她们在蒙鹤被释放后不久结为夫妻。

国家文学家及诗人乌斯曼-阿旺在 1950 年代期间，曾经从这位普世人道主义者及积极进修马来语文及文化的陈蒙鹤身上，取得诸多写诗的灵感。她不计民族、语文和文化背景，广加结交，使到她与 1950 年代及 1960 年代的马来语文及文学泰斗成了知交，包括如克里斯-玛士、东革-华兰（即乌斯曼-阿旺）、阿瓦姆-伊尔-沙尔甘、马苏利和阿斯拉夫-哈芝-华合。陈蒙鹤本身则与林焕文、吴诸庆、杨贵谊、陈妙华夫妇等人齐名，属于马来语文及文学的爱好者，精通马来语文。

我在 1961 年被驱逐回新加坡之后，经常跟胡森-扎希汀找陈蒙鹤替国家翻译中心（National Translation Bureau, NTB）协助翻译工作，那是我们设立的翻译公司，收入作为维持前《马来前锋报》罢工工友的生活费。

陈蒙鹤是名和蔼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人都一样和蔼可亲。她从来不拒绝我们的要求，常常还用极为亲切的笑容回应。我真敬佩她那乐于助人，但却不望回报及赞美的作风。在跟她的交往中，我从她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而她不吝于分享她的经验。

至于我自己个人，为了建立我们两个家庭之间的家庭感情和联系，在未征求她的同意下，我用她的名字琳达（Linda）作为我在 1963 年 2 月 2 日被捕之后三个月出世的最小的女儿的部分名字。我的妻子莎拉玛非常同意我所选择的字诺琳达（Noorlinda）。

只有在 1979 年被释放及我们有机会重逢之后，我才跟陈蒙鹤和她的先生陈承发博士讲起这个取名的真相。

“赛，你和莎儿肯用我的名字，我感到非常荣幸。”陈蒙鹤开心地笑着说。当时，她是跟夫婿在我被释放的那一年来我家过开斋节。从此，陈蒙鹤和陈承发每一年的开斋节都来在合巴樟宜路住家的餐会。我每一年都办这样的餐会，目的是重新建立我们这些在冷藏行动下被捕之前的那份情谊。

1963 年 2 月 2 日早上，在欧南监狱，陈蒙鹤跟占姆斯-普都遮里就在我站的地方不远之处的一张桌子在进行登记。他们同时用笑容跟我打招呼。我发觉，他们的招呼和笑容带有惊讶的神态，似乎是不太相信我会在那儿，跟他们拥有相同的命运。

我只能够向他们两人问好，得喊相当大声。他们两人都挥挥手，不说一句话。在我被指示向前进行登记时，占姆斯-普都遮里和蒙鹤已经被带走，不知是到哪里去。

## 未经审讯的‘犯人’

虽然我未曾成为罪犯，监狱却强迫我穿上囚衣。那天早上，我根本没有任何身份，不是罪犯，也不是政治扣留者，因为我未曾经过法庭审讯，而扣留令还未发出。那么，我是以什么身份被带到监牢及被迫穿上囚犯衣服的呢？等下我要问问他们，我心里说。

来到一扇看起来很厚及建得很坚固的小门前，那个跟着我的浓胡须和大个子，样子凶巴巴的狱卒用大锁匙打开门，那锁匙转了两三转门才打开，我于是踏过门槛直接进入在我左边跟第一座相对的牢房。

## 赛-扎哈利

在那牢房内有个华人青年。他躺住看着牢房内离地极高的天花板。他看来正在呆想，当看到我站在他的牢房前时，即刻跳起来。

“赛-扎哈利，……”他叫道。那青年看来认识我，于是我举起手回应：“是，是！”可是我无法认出他是谁。无论如何，我知道他肯定也是刚在今天早上被捕的战友。我想跟他说话，却已经被那个跟班狱卒推着往前走。我的那位新朋友继续用华语喊，我的名字说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我还未学华语，所以除了我的名字以外，并不知道他在喊什么。

整座牢房闹哄哄了。第一位的喊声，由在其他牢房的战友接上了，一个接一个的，一直到我抵达我自己的牢房。他们发出喊声的目的，是要“欢迎”我，同时把我介绍给其他在较早时已进入牢房的战友们。

欧南监狱在那个早上一片热烘烘，像是同乐会。

我的牢房打开了。我被叫进去里边，然后房门被关上，刻意用上重重的冲撞声，差点要震破我的耳膜。我奇怪为什么得那么大力来关门，看来那是故意的。是要吓唬我吧？可是，吓唬来干嘛呢？我不能理解，然而，那心理上的冲击，我却是深深感觉得到的。

在我还来不及问清楚冲凉房在哪里？厕所在哪里？之类的问题之前，那狱卒已经消失了。

接着，我听到牢房关门碰撞的声音，中间夹着新牢民名字喊声。在那区区的几分钟内，我不知已听到多少番的开门和关门声，砰！砰！砰！的，像暴雨时黑色的天空闪电后的雷声。我心里在细语，今天早上一定很多人被捕。

在我的牢房内，已经有一张小尺码的草席，一张又黑又厚的被和白铁杯。我刚才要问狱卒关于厕所所在，很快就有了答案，我看到牢房内有一个粪桶（大小使用的马桶，铁制，有盖和有柄）。我一生人，从不曾在这样的粪桶大小便过，便后要清洗又怎么办呢？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卷厕纸。“这些没教养的家伙，做人不知道有文化，……”我对着自己发出怨言。

在我的牢房外面，喧哗情况继续着，不曾停下来。那噪声简直是比芽笼士乃的鱼菜市场还忙碌，再加上牢民的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勇敢，敢拿起粪桶敲击着地面，发出响声抗议当天早上对我们的逮捕。

狱卒们忙着跑上跑下，来来回回，不停地从官差取得指示。他们看来似乎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如何克服这么多的新牢民，一批又一批的。他们很显然对这样的情况非常不惯。这证明了，在冷藏行动下逮捕左翼政治活跃分子的行动非常保密，连欧南监狱的官差都被瞒住了。因此，我看到狱卒们愕然地听着那天早上才进来的牢民的喊声和咒骂声。

“叫他们安静！”一个官差大声地发出命令。“喂！安静！安静！不要吵！”接着就听到一位狱卒听令行事。

“你才安静！”我听见一位牢民大声回应。

其他的老友们群起加入：“你安静……你安静！”大家一齐喊，更大力地用粪桶敲击士敏土。有的还摇晃牢房门，高喊政治口号。

我的心似乎感到一阵舒畅。担心、忧虑和害怕的感觉已经完全没有了。相反的，我感觉到精神一振，在他们的喊声和政治口号声中，感到源源不绝的力量。

牢房内的早祷

（此节略）

生活的现实

（此节略）

“这儿是监牢，不是酒店”

（此节略）

## 第五章 新加坡和半岛的大逮捕

那一天早上，的确是有超过一百名的新囚民进入欧南监狱，他们的身份还未确定，监狱乱成一片，乱糟糟的。欧南监狱以外的人们又怎么样呢？在半岛的大都会，如新山、芙蓉、马六甲、吉隆坡、怡保、瓜拉登加楼、哥打峇汝、玻璃市、亚罗士打和檳城的情况又如何？他们当然都在1963年2月3日，星期日早上打开报纸时大吃一惊。

所有的报纸，马来文、英文、中文和泰米尔文都大篇幅报道新加坡、马来亚和英国当权者组成的内部安全理事会在新加坡对付共产党分子进行大逮捕的新闻。当权者都在高呼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已经破获共产党策划要推翻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进而威胁马来



亚的安全的阴谋。”

封面的头条新闻都用大号字，制造一个马来亚、新加坡当局和英殖民者“成功地”把新加坡从“共产党”中“救了出来”的印象，并刊登被捕人士的照片。他们包括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新加坡人民党的领袖，工团，如位于密驼路的店员及工厂工友联合会，新加坡商行雇员联合会，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南洋大学学生会的领袖，以及跟社阵及人民党关系密切的人民协会成员、新闻从业员和个人。……（略）

我被归类为新闻从业员，照片跟马哈迪哇摆在一起，也出现在那个星期天报纸的头版。其中，其他被捕的新闻从业员还有傅超贤和陈新才。

如果那次大逮捕是在中午或下午进行，我和马哈迪哇肯定逃脱。我们已经计划好在早上十时飞离新加坡，前往雅加达去参加行将在那儿举行两个星期的亚非新闻同业秘书处会议。

马来亚和新加坡当权者在大逮捕当天发出的告示，旨在恐吓民众有关“共产党”的危险性。他们指共产党要控制新加坡，然后，从马来半岛南部的这个岛屿，“已经取得控制权并获得其他共产国家资助的共产党将把其翅膀伸进马来亚。”

在1963年2月13日，类似新加坡的大逮捕在马来亚展开。所有反对殖民主义者所梦想的马来西亚计划的政党领袖都被抓进监牢里去。

我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获知这项大逮捕的消息，那是在妻子莎儿和岳母艾丝玛-胡欣到位于必麒麟街上段的中央警署的单独监禁特别扣留所来探监时获知的。

在问了我的情况之后，岳母忽然用爪哇土语说：“那边的朋友也都被抓了。”看守我们的官差根本听不懂爪哇土语，而我只是笑着听。我心中在细语，我早已料到了。

我已经超过两星期没看报纸了。于是，岳母所带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也是“最新消息”，尽管我一直预料会这样的。……（略）

## 混淆黑白的骨牌论

为了说服和恐吓马来亚和新加坡两地民众，尤其是马来亚的马来人，有关共产党的危险性，新加坡、马来亚和英殖民地当权者提出他们存心要混淆黑白的“骨牌论”。

殖民主义者原本提出的“骨牌论”假设在印支三邦（越南、寮国和柬埔寨）全部成为共产国家之后，泰国将肯定共产化，接着马来亚将成为共产国家。就像玩骨牌那样，头倒了，在它前面的骨牌将一个接一个倒下；开始是印支骨牌倒下，到泰国骨牌，再倒向马来亚骨牌，进而倒向新加坡骨牌。于是，新加坡就会跪倒在共产党的脚下。

很轻松，不是吗？会弄骨牌的小孩儿，在看到最后一块的骨牌倒下时，会大声笑和拍手欢呼胜利。

这个“骨牌论”是由帝国主义发明的，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两大集团进行冷

战架构下的产物，东方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而西方则是由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因此，他们进行激烈的竞赛，竞相要扩大本身的影响力，进而争取中间国家，即不结盟中立国家，非共和非资国家靠到他们这一方来。

“骨牌论”的确有它的逻辑，只是它要成真却并不是他们假设那样的简单。由新加坡、马来亚和英殖民者组成的阴谋集团，在引用“骨牌论”时，总是刻意地隐瞒一项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东南亚已经掌握霸权那么久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绝不会让马来亚，遑论新加坡，被共产党掌权。他们必将动用他们手上已经持有的一切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确保他们能够继续维持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防务的控制权。

跟越南、寮国和柬埔寨的反殖斗争不同，当时的马来亚共产党（马共）在反殖武装斗争方面正处于“低潮”。在 1950 年代中，尤其是 1955 年 12 月在吉打华玲举行的会谈失败之后，马共的游击战士已经北撤到远远的马——泰边境去了。……（略）

新加坡变共产？

如果在 1950 年代中到 1960 年代初，马共在马来亚大陆（马来亚联合邦）已经完全丧失通过武装斗争夺权的能力，讲马共有能力在新加坡这么做不是天方夜谈吗？更何况，英殖民政府本身的情报组织已经知道和承认，在最近的这几年，英国在东南亚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的确已经没有了有组织性和活跃的马共组织。那就是说，新加坡根本不再受到马共的威胁了。真的难以令人相信，马共领袖在未能使马来亚从殖民地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情况下，还会想到要在新加坡去建立起一个共产党政权。我个人根本就不相信，马共领袖当中，会有人去制订一项政治目标是那么幼稚无知和根本不实际的政策。

可是，新加坡、马来亚和英殖民者政府阴谋集团，却故意夸大共产党的危险及威胁，目的就只是为了要恐吓新加坡和马来亚人民，尤其是马来人，那就是说，他们用共产党这个妖魔化的帽子来吓唬民众，可他们真正害怕的却是由社阵和人民党两个反对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共产党红帽子，通过三个政府的宣传机器，以及他们控制的印刷和电子媒体，被毫无忌惮地广泛滥用。尽管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当然（前）的这项争论性课题，根本就不是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受到马共威胁的问题，而是李光耀个人和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安全问题。……（略）

奴性依然

（此节略）

从欧南监狱到樟宜监狱

（此节略）

## 第八章 政扣者的要求

严峻和刻意刁难政扣者的条例，以及对政扣者生活安宁的种种干扰，是我们所抗议的其中一部分对象。我们要求放宽条例和终止一切干扰。我们也要求每星期获准带超过六本书进牢房。同时准许阅读未经过滤删剪的国内外报纸和杂志。我们也要求每星期能够带进来足够份量的干

粮和罐头，以辅助监牢内政扣者食物供应之不足。

还有另一项要求是每一周政扣者会见家属，应该像搬来明月湾前那样，在公开的场所，让政扣者与家人自由交谈。我们不要在密室里，政扣者与家属由玻璃隔开，只能够通过电话筒交谈的那种会见。

我们各座之间通过“秘密联系系统”进行了多次的讨论之后，一致决定展开罢食，以抗议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新条例。开始时，营方和政治部都不相信政扣者的罢食能坚持太久。可是，一个星期之后，我们还继续坚持，他们就开始动粗了。监狱医院的官员和几位大个子的凶恶狱卒，被命进入牢房来强迫政扣者停止罢食。否则，他们要用灌管强迫灌食。

### 煎虾和咖喱鸡

在 B-5 座，我和另外四位战友决定在第一个星期全面绝食，即是说在那七天里，我们不只拒绝进食，也拒饮。

按照这个决定，由营方供应的早、午和晚餐，我们完全不动，就搁在牢房的门口。我发觉，给我准备的食物（马来/印人餐）跟平常的很不同。在我们罢食期间，食物好，量又多。平常如鲱鱼那样的小鱼，现在变成大甘望鱼，蔬菜样式也多了。另外有一天，我发现给我的饭盒里，放着两只好大的炸虾，还有咖喱鸡。

其他难友的食物也是一样。看来，他们是那么想引诱我们去进食和开饮，才用上了比平常好的佳肴。但是，这一切手段根本无法改变我们继续罢食的决心。

……（略）

不吃不饮足足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 B-5 座的政扣者改变策略。为免自己遭受危害健康的“强迫灌食”，我们同意，从第六天开始，我们只在早、中、晚餐时只饮一小杯牛奶。

每天只饮一小杯的“斋戒”，我们一直坚持到第十八天。然后，我们在 B-座的难友针对“强迫劳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严肃的讨论，重新权衡对短期及长期政治斗争的得失及风险。

最后，我们取得一致的共识：这一场罢食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所作出的抗议行动已经足以向营方、政治部，特别是李光耀政权证明我们是敢于采取那么剧烈的行动的。它也证明，当情况需要时，我们是有决心可以继续罢食的。

那项决定只是我们 B-座的决定，不涉及和不影响营内其他座战友的行动。

### 影响健康

我们在 B-5 座展开为期 18 天的罢食，对我们本身的健康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我自己的体重减少了 18 磅，即平均每天减一磅。我们的身体变得很瘦，以致在囚室内站起来要走几步路就有轻飘飘的感觉。我还是强迫自己每天要站起来走几步，早上一次，下午一次。很奇怪，我一点也不感到饿或渴，只是身体觉得很弱，没力气。

罢食的首三天对我来说是最辛苦的，尽管我已经对拉玛旦月（Ramadan，回历九月，即斋戒月）斋戒有了许多次的经验。开始是胃咕噜咕噜响，然后感觉胃有点胀气和发痛，甚至有很想吐的感觉，虽然事实上，在那收缩的空胃里，根本就没有可吐出来的东西。

对肉体所造成的一切不适，我都是尝试用思想的武装来加以克服。就如人们所说的，利用我们的精神思想来战胜物质，显然那个方法证明是很有效的。经过几回的尝试，胃里的咕噜噜音乐停止了，接着不适和想吐的感觉也减轻了，最后是完全没有了。幸好在这段罢食期间，我从未呕吐过。

在那一个星期里，其他的牢友，有的胃痉挛，头晕和天旋地转；有些是胃痛，呕吐至无力起身和走动。可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忍受着痛楚和饥饿，继续耐心地继续那第一场考验，一直到第七天。

那 18 天里，我们被关在各自的囚室里，除了一天上午、下午两次冲凉以外。其实，那时候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冲凉。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刻，我们趁机互相鼓舞，勉励要坚定，要随时提高对抗当权者暴政的战斗士气。罢食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有新的共同决定为止。

从展开马拉松政治罢食开始，我们这一座跟其他座战友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因此，在我们进行了 18 天的罢食之后，对于其他牢友是否已停止罢食是一无所知。

可是，在拥有许多牢友的 C 座和女扣留者的那一座，扣留营当局是采取了暴力行动来迫使结束罢食。

### 残暴的强迫灌食

经过一星期多的罢食，及继续拒食拒饮，C 座有几位政扣者晕倒，使营方感到不安。

在政治部官差的施压下，监狱医院的一位医生和一位助理被派进牢房，劝政扣者放弃罢食。但却没有人理睬他们。

C 座同志已经立下决心，拒绝跟当权者作任何妥协。相反的，他们已经准备面对一切可能出现在他们身上的风险。由于这项坚决的行动，他们承担了失去生命的危险，就为了要否决行将在明月湾监狱推行的强迫劳动。

完全拒绝要作出任何妥协的政扣者包括麦哥-弗南迪（Michael Fernandez）、哥文达三美（P. Govindasamy）、何彪、谢太宝、云昌定、陈美和、李学训、黄成发、蔡寿川、立兴、张福群、黄美贵、林明强。女政扣者则包括刘丽英、吴平华、林雅娟、沈仲叶和黄桂英。

最后，残暴的李光耀政权下令监狱和政治部人员采取行动，用强迫灌食来迫使政扣者进食。监狱当局遵从这项残暴的命令，并以粗暴的手段强行，以致危害好多政扣者的健康，或在肉体上，或更甚的在精神上。

其对政扣者产生的心理效应深刻而长久。在那一场艰辛的事件过后的许多年后，医生还可

以从政扣者身上发现到他们的病根，就是强迫灌食所造成的心灵创伤。

那项残暴折腾的苦难经历，一直到今天还困扰着一部分前政扣者的生活和精神。因而造成他们都不愿意再谈起政治，或是那些能够勾起他们在明月湾监狱长期罢食回忆的种种。

我的战友在承受可能随时导致死亡的肉体折磨时，所表现的高昂斗志和无比勇气是不可争辩的，必须给予最崇高的敬意和承认。

……(略)

为了对付明月湾监狱战友们的战斗精神，本来就对政扣者有偏见和敌意的营方，粗暴和毫无人性地对政扣者展开了强迫灌食。

他们粗暴和胡乱地把胶管插进喉咙。因为行事时不细心，全体政扣者都感到痛楚。他们甚至挣扎和摆动被绑在椅子上，同时被孔武有力的大汉抓紧着身子。政扣者痛楚的叫喊声根本不受理会。

的确很难想象，本来是分派在监牢照顾牢民健康的医生，在那个时候来到时竟然只是张着眼看着监狱官员粗暴地对付政扣者。那个医生就那样看着那残酷的事情在发生，什么都不说。他在那儿出现，看来只是要确保受酷刑的政扣者不至于被弄死罢了。

这就是成了李光耀政权的工具的医生的德性。这样的医生，已经忘了作为一个医生在对病人和群众执行医务时必须负起的责任和医德的誓言了。

#### 麦哥-弗南迪的遭遇

我的好友麦哥-弗南迪，大罢食时正好关在C座，大约在1973年左右，即那次马拉松罢食过后一年余，我们恰巧在罗宾逊路特别扣留所碰面。麦哥向我讲述李光耀政权是如何残暴地对付在未经审讯下被他囚禁的政敌。

那次意外会面后不久，我重新被送回明月湾监狱，继续扣留。与此同时，麦哥-弗南迪则跟另外五、六位罢食期间同座的扣留者一起获释。

“我们罢食一个星期之后，监狱医生和另一位助理进来我的牢房，由几个凶巴巴的大个陪同，”麦哥开始讲那故事。他们强迫他坐在椅子上，把他的身体绑住，双手扣上手铐。

麦哥-弗南迪是受高等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是一名工运领袖，他感到惊讶，一个医生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让狱卒在他眼前，任由施虐。麦哥向医生求助，却毫不受理，“可是，从他的神情，我知道他感到内疚，只是没有勇气做些什么。”

“赛，不管你相信与否，他们是用撬子硬撬开我的口。然后，他们把塑胶管塞入我的喉咙，把奶灌入管子里。我大力挣扎，以至吐了，那些强灌的奶吐了满地。他们抓紧我的手和身子，使我挣扎不得，然后再强行灌奶。”麦哥-弗南迪叙述说。

麦哥坚决不肯向他们的意愿低头，造成他们施加更进一步的折磨，他们继续用强行把奶通过塑管灌进他的胃里。麦哥又吐出来，所有灌入的奶全吐出来。新的奶又强行灌入，麦哥-弗南迪又吐了出来，一连好几次。最后，麦哥昏了过去，直接被送到监狱医院去治疗。

总共 23 天，麦哥-弗南迪都是血管被穿管滴液渡过的。他的情况稳定后，重新被送回到明月湾监狱。他跟其他继续坚持罢食的政扣者继续罢食。营方继续强迫灌食，那些战友则以坚决和更高昂的战斗精神来继续面对折磨。李光耀政权就是这样残酷地对待未经审讯而加以囚禁的政治扣留者！

其他的战友也遭遇到麦哥-弗南迪那样的痛苦经历。同样的残暴恐怖行为也施加在何彪、哥文达三美、云昌定、陈美和、蔡寿川、吴平华和刘丽英等政扣者身上。

寿川是南洋大学的毕业生，跟我一起在 1963 年 2 月 2 日被逮捕时是一名工运领袖。他告诉我，在政扣者对拒绝行将实行的强迫劳动条例的立场坚定不移的情况下，营方是如何不得不认输。

“在对政扣者进行折磨和迫害了两个多月之后，营方‘认输’了，停止强迫灌食。但是，他们还是不要撤销那些新条例。他们让政扣者再继续愤怒地罢食了一个星期。”寿川说。他是在怡保的传统酒店(Heritage Hotel)告诉我的。……寿川继续解释说营方在折磨政扣者两个月之后，“任由我们继续罢食，其目的是要打击我们的斗志，及要观察他们的酷刑对政扣者产生的效果。”

## 第十章 在红萝卜跟大棒子之间

最后，我是在乌敏岛渡过一整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在 1979 年 8 月 22 日恢复完全自由，回到新加坡本岛。我的战友林福寿医生则在我之后约一年被释放回新加坡本岛。

另有两位政扣者被李光耀政权放逐到孤岛的是民选的立法议员。第一位是李思东，武吉知马区议员，他在 1963 年 9 月大选中中选时即被逮捕，完全没有机会为支持他的选民服务。他在我从乌敏岛被释放回来的几个月后放逐到那儿，在岛上住了将近两年。

另一位是谢太宝，三巴旺区议员，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他也是马来西亚国会议员。谢太宝在新加坡本岛被囚禁了 23 年之后，被放逐到圣陶沙岛。他在该岛被放逐了好几年之后，才获得全面自由。因此，谢太宝是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未经审讯被扣留为期最久的政扣者。他被捕时 25 岁，在 1992 年获得释放时已经是将近 58 岁了。

林福寿医生、李思东、谢太宝和我四人分别放逐到乌敏、德光和圣陶沙岛，被许多国内外观察家和评论员视为是李光耀对反对其政治手段及拒绝低头人士的报复证据。

谢太宝跟《新闻周刊》的讲话

谢太宝被释放后不久，接受《新闻周刊》杂志的访问，他被问及在漫长的扣留岁月里什么是他经历的最可怕的经验。他回答说：“当我被单独监禁的时候，单独关在黑房里，不是平常

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内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为了吓唬我，政治部人员说人被关在那样的环境下，几天就会变疯了……。一天晚上，我听到有人大力踢我的牢房门。我想，那个人的的确是疯了。”

谢太宝熬过在黑房单独监禁的苦难日子。他说，他对着自己说话，以免丧失脑力及确保自己清醒应该对自己做些什么。谢太宝甚至将自己当时的苦难跟外头更为不幸的人士，如残障和盲眼者相比。他们的生活难道不是比他还苦吗？谢太宝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持自己头脑的清醒和他那坚强的斗志。

当被问及他被监禁那么久的原因时，谢太宝回答说审问他的调查官对他说过，他只有在签署一份由政治部人员起草的自白书后才能获得释放。“他们要我承认我是渗透进入社会主义阵线的马来亚共产党党员……。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员。所以我拒绝签署。”他解释说。

谢太宝对于自己拒签那份自白而造成不能获释而继续被扣留那么久一点也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呢？政府要强迫我签署假声明……。我绝不会这样做的。这违反我的良知。我自己将不能心安理得地过活。”谢太宝郑重地拒绝政治部要他投降的条件。那么明确的答案，反映出他在扣留期间直到释放所坚持的立场。

### 拒绝国家语文学院院长的肥缺

在 1960 年代初，为了急着要表现提升马来文作为国语的地位，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权成立了国家语文学院。在新加坡政府要求下，印尼政府借出了著名语言与文化学家史拉末-姆里约诺博士（Drs. Selamat Mulyono）出任第一届院长，为期二至三年。可是，根据我过后被送去樟宜监狱不久后所听到的消息，合约尚未期满，史拉末博士就辞职回到印尼，满怀失望之情。

据说，这位印尼的语文和文化专家对他所坐的位子感到不安，因为新加坡政府根本就没有制订明确的语言文化政策。他感到无所适从，因为该学院没有确定的政策，有的就只是当权者要像他这样一个名气很大的学院院长去执行的一些模糊的指示。

突然间，我的名字被拉进这一家我原本就怀疑李光耀政权成立时的诚意的学院的故事中去。当一组由副警监蔡麦哥为首的官员来探访我的时候，当他们一谈起那间刚刚没有了院长的学院时，我立刻意识到他们正在作一些不太对劲的安排。他们是有备而来，看来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那时候，我在必麒麟路上段的中央警署顶楼的扣留中心被单独监禁。我正在承受恶劣的精神折磨，对我的思想产生很大的混淆，产生混乱。所有在那种情况下被单独监禁的政扣者，都是处于不知所措的状况，更何況在受审问时，被连串的虚假指控、要胁、恶言、毁谤和秽语所轰炸。

### 政治贿赂

那天中午，吃过中餐后，我被带出单独监禁牢房，直接被带进审问室，面对一群两面三刀的政治部官差。

蔡麦哥副警监带头说话：“赛，我们有东西要跟你谈谈。”

“是吗？是什么事？”我反问蔡麦哥。于是，他对着我讲关于国家语言学院的事。蔡麦哥说史拉末-姆里约诺博士的合同已经期满，回去印尼了，该学院的院长位子正空着。他说政府正在找人填补史拉末博士留下的空缺，招聘广告已经在报纸刊登了。

蔡麦哥停顿一下，看着我的眼睛，等待着我的反应。我默不作声，因为那时已经猜到他们那天来见我的真正用意。我已经可以正确猜到，那个院长的位子会被当成政治贿赂那样来向我开价。

## 图穷匕首见

当看到我默不出声，蔡麦哥又开口了：“赛，我们以为你是最适合的人选。你肯定是有资格的，拥有这份工作所要求的语言能力和新闻从业的经验。”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意识到，蔡麦哥副警监已经把卷图开尽，现出匕首来了。显然，他们提出献议是没有诚意的，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跟着蔡麦哥来的两个人，一个是名叫哈仑警长的政治部人员，另一个叫惹拉，自称是文化部的研究员，跟着都拍我的马屁，吹捧我，连声承认我有资格接任史拉末博士留下的空缺。

“赛先生，的确很难找到像赛先生那样的适合及合格的人选。我们希望赛先生能够接受，”哈仑警长说，一心要我接受那个职位。惹拉这位文化部的研究员则不断点头，迎合着哈仑警长。

他们两个看来已经是自愿充当政治行贿的说客，甚至他们是认为那政治行贿是多麽不可抗拒，以致我难于推拒。

最后，我觉得向他们表达我的立场会比较好。于是，我感谢他们对我能够胜任那个学院院长所表达的信心，可是，如果要获得那份工作，我得先获得释放。

于是，我跟着说明：“你们应该向政府建议先释放我，不附带任何条件。释放后，我将正式申请那个工作。由于你们大家都认为我足够资格，那么我的申请一定会被接受，不是吗？”

我明确表示我不可能出卖自己的人生原则和政治立场，以换取那份工作。如果他们要我出卖尊严以获得工作和自由，我会把那个献议当成是政治贿赂。

接着，我又说，把话直指向蔡麦哥副警监：“你先去做李光耀那边的工作，让他无条件释放我。然后，身为自由公民，我才像其他的申请者那样申请那份工作。”

蔡麦哥本来是以严肃而满怀希望的神情听着我的解释，最后，他笑着说：“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麽简单”，他重复着说，那语气是既失望，又像在挖苦。

“当然不简单。”我的答案很干脆。

我发觉那三个政治部人员似乎被我的那项‘先无条件释放’的要求给吓呆了。他们尝试解



释说，释放的问题可以较后才处理，“可是，现在，赛先生可以先提出申请，不必等到释放后，”他们说。显然，他们根本不打算要理睬释放我的要求。

我已经没有力气去继续应酬他们，就用坚决的语气说只要我未被释放，尽管我对那样的工作感兴趣，也不会去申请那国家语文学院院长的职位。

## 红萝卜或大棒子

那些政治部的调查官，在对政扣者施加苦难之余，总会演一场戏，给思想混淆的政扣者伸出几根红萝卜来，充和蔼讨欢心的。这些刚刚无耻地对政扣者进行威迫和污辱，对本身的罪行根本毫无罪恶感的刽子手，摆出了“软”的样子，假装“好好善待”政扣者。

在那种困惑、迷乱、恐惧和紧张的情况下，好多意志稍弱的政扣者就不小心咬到那“红萝卜”贿品了。他们接着就跌入所设好的陷阱，以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最后陷入懊悔和叛变的境界之中。他们接着下来被李光耀政权充分地利用，被迫出卖本身的人生和政治原则，出卖他们及同一条政治线上战友的斗争。

在不小心吃了“红萝卜”之后，他们接着就发表自白，表示后悔参与反对党政治。本来不是共产党的也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后悔”支持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他们也承认后悔在他们被捕之前反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合并，以及反对组成马来西亚。

他们当中，有些被选中当“电视明星”，由政治部特工直接访问，在黄金时段播放。于是，人民行动党统治史上出现了令人恶心作呕的最大政治丑剧；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成为“电视明星”者都对他们的政治“罪行和错误”忏悔。有一些是假装“忏悔”，以求本身尽早获释，以摆脱监狱的非人生活和长期的精神折磨。

但是，也有是真正悔过的。他们祈求原谅，不再涉及反对党政治及“马共活动”，而他们其实在之前根本就不曾涉及马共，遑论马共的武装斗争了。这类人悔过之后，还歌颂李光耀政权，并誓言全力支持李光耀政权。他们就因此被迫每年8月9日参加新加坡国庆日游行，以证明他们对李光耀政权的不二效忠。甚至有一些不单只是悔过，还变节投敌。他们不只背叛同志及所代表的组织，而且积极对抗和敌视昔日的同志。

## 观赏同志成为“电视明星”

在樟宜监狱的E座牢舍，我有幸有机会一睹“电视明星”表演的风采。当获知有“已被击垮”的政扣者要上电视当明星时，想一睹其风采的牢友就会在当晚齐聚在A座。

我发觉有些牢友很紧张和不安，因为那晚上要上电视当明星的政扣者，是我们一路来视为是很坚持其政治立场的人士。许多政扣者，不管是新人或旧人，都很敬仰和崇拜他。

我们所不知道和从来未曾想过的是他在跟我们一起被扣留时的感受和政治观点。他为人聪明，很用心学习，勤劳工作及积极运动，被扣留已经很久了。他起初是被英殖民者所逮捕和扣留，然后由李光耀政权继续延长之。事实上，李光耀政权是把他和他的其他同志当成了“政治人质”。我想，这暴露了李光耀的政治手段，纯粹就是在英殖民主义的支持和协助下，满足他

个人的政治议程而已。

他和他的几位同志，被指是导致李光耀失掉人民行动党领导权的黑手。后来，是英殖民者用紧急法令，即今日的内安法令，逮捕和扣留他们，救了李光耀，使他重新坐上人民行动党领导的皇位。就这样，李光耀得以继续被英殖民者所利用，以对付左翼反对党政治的崛起，进而维护英殖民主义及西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利益。

李光耀对他和那一批战友的仇恨是非常明显的。当他们被捕三年之后，人民行动党在 1959 年上台执政，李光耀拒绝释放他们。我深信，在那个晚上行将成为“电视明星”的那位同志，的确是感觉到他是李光耀政权的政治人质。

人民行动党保证，在赢得 1959 年大选之后，就会释放他们。那是李光耀跟当时几位还被关在监牢里的人民行动党领袖达致的协议。这些领袖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占姆士-普都遮里和悉尼-兀哈尔。据说李光耀同意若人民行动党胜利及组织政府，将会释放所有的政治扣留者。可是，在赢得该次大选后，李光耀即食言毁约，只是释放那些被扣留的人民行动党领袖。其他人，包括行将要成为“电视明星”的那位，都继续被扣留。

在 1963 年 2 月 2 日冷藏行动时，他跟其他多位政扣者已经被扣留了好几年了。在新加坡于 1959 年大选后实行自治之后，我个人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继续扣留他们。

他们在未经审讯下被扣留，因为他们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那之后的政治，他们根本就未涉及。英殖民者不释放他们，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他们被捕时强加给他们的指控，那并不是指他们把李光耀从人民行动党的领导推下来，而是指他们从事“危害国家安全”，那是指英殖民主义者的安全的颠覆活动。

在殖民地时期，旨在赶走殖民者的政治活动，不管是在殖民地本土，或是在任何地方，的确都是被殖民主义者及其鹰犬指为是“威胁国家安全”，所谓国家，是指英国的殖民地。因而，在 1950 年代期间，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反抗英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活动，被英殖民者及其鹰犬形容为颠覆活动。

在 1948 年紧急法令下，英殖民者设立监牢和扣留营，囚禁抗英志士。这个做法过后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所继承，施用至今。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内部安全法令。

就因为这样，当那位准“电视明星”在冷藏行动过后拒绝加入我们政扣者之间的政治讨论时，我和一部份牢友并不在意或失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他对我们的斗争的支持，因为那也是他和他的战友未被逮捕之前所坚持的斗争：反殖，争取祖国脱离英国统治的独立斗争。

因此，当他被政治部调离 E 座牢舍的那一天，即戏在电视上演的前几天，我们一大群人给他送行，就像每一回政扣者被政治部带离扣留营所做的那样，跟这位“众人敬仰”的同道说“珍重，坚持下去，斗争下去”。

昔日英雄今日狗熊

那个晚上，E 座牢舍 A 座的气氛可说是相当紧张。在座后方的电视厅挤满了人。当镜头焦

聚在那位准“明星”时，我看到他腼腆地微笑（他当然知道我们正在 A 座面对着电视机）。我们的同志在那个时候是怎麼样的感受啊？

从他的面部和腼腆的笑容，我想他好像是有点不好意思，感到有点内疚，就像一个人意识到本身已经令那些他知道一直以来都对他敬爱、崇拜和敬仰的战友大失所望那样。他看来似乎是感到懊悔，因为，现在反而是他要向那些因为拒绝依照他跑的路去换取个人释放而将继续蹲在牢房内的战友们道别了。

他很擅长隐藏起这一类的情感，倒是看起来很安适，毫不紧张，他并不像之前或之后的“电视明星”那样烦躁不安。

无论如何，我并不认为他有意要背叛还留在监牢里的战友们。我也不认为他有“出卖”战友，以无力的失却尊严式去换取个人本身的释放。相反的，我只是认为，他仅仅只是对当初未被捕时投入反殖政治运动的原本原则立场不再有信心了。我也认为他是对监狱生活感到厌倦了，而却又完全看不见前面有任何光明。或许，他要像平常人那么样，成家立业吧。

也许因为这样，他为自己找了条比较好走的出路。他需要“自由”，准备照对方的开价付钱，尽管那代价是多高。他不想再跟牢内的战友有任何瓜葛。他要为自己开拓新生活，忘掉过去的历史，为自己的生活展开新页。

可以肯定会有战友不满他在电视里的那看起来有点骄傲、装作和若无其事的无拘表情，甚至还会发出微笑。于是，好几个人的口中发出了骂人的粗话。其他大多数人都默不作声。

那位“备受敬仰”的朋友明确及流利地回答政治部特务所问的每一道问题。他说出他对参与导致他被扣留那么久的斗争感到“失望”的原因。他已经对斗争目标失去了信心，现在，他要“浪子回头，步上正途”。

## 隐去一切苦难经历

对于他在九年之前被捕初期的苦难经历，他只字不提。对于他在单独监禁时所经历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如何被殴打，如何被残暴及毫无人道地拳打脚踢，以及其他诸多发生在他身上的酷刑，在他当“电视明星”时根本没有只言片语。那一切都被隐去了，似乎他已经很宽宏大量地宽恕了那些折磨他的人。

相反的，在英殖民者政治部特务，即后来又成为李光耀政权政治部特务的那批人，施压捏造新故事。于是，他用甜言蜜语歌颂说，他在长期的扣留岁月中，得到很好的待遇，叫他感到很满意。

可是当他装出洋人所说的扑克牌脸，一脸正经，对人民行动党领导李光耀总理大加赞扬时，镜头就作近距离大特写，使他的脸占满整个电视镜面。这时，#@%^!……对他的咒骂声就响亮地在电视厅围绕，那骂声很响亮，语调很是愤怒和激动。在那个时刻，任何人都很难去怪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应。

连续好几分钟的时间，电视厅回响着咒骂的响声，几位大感失望的战友，已经不能忍受看着一位长期以来非常“信任和敬仰”的战友，突然之间变成了叛徒，开始破口大骂了。他们已

经无法忍受，更何况他们是亲眼看到那一幕，尽管那仅是通过电视所见。

有些战友听不进那些赞语和叛徒之言，于是就喊关掉电视，回房睡觉。当我们各自走回房间时，还一直听到咒骂声。

## 第十一章 “自由”何价

吃了“红萝卜”政扣者的声明，通常会在印刷及电子媒体大篇幅报道。事先录制好，内容在播放前由政治部过滤的“电视明星”访问，也是这样子处理的。“访谈录会一再修改，重新录制，一直到负责的政治部人员确实满意访谈的政治内容真正够满足李光耀的虚荣心，“电视明星”的表演才向大众播放。

所有政扣者发表的声明，内容其实都是政治部准备的，有关的政扣者必须同意并署名，然后才发送给传媒。由于要获得“自由”，不管是否喜欢政治部所拟好的声明内容，要发表声明的政扣者都得签署表示同意。不管是愿不愿意成为“电视明星”，这类政扣者都得在电视上亮相，供大众观赏。其中有些人被迫得这样做，因为忍受不了单独监禁期间审问的折磨和迫害。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他们所必需付出的“自由”代价——这样一种失却人格和尊严的自由，是政扣者基于本身的个人理由所作出的抉择。

在获得“自由”之后，他们行将过的新生活中，在精神和思想上，肯定一直都会受到这梦魇的干扰。这种干扰，尤其是在他们一时之间回忆起在斗争时期的苦乐时发生，尤其是想起对还被关在牢内的同志的旦旦誓言的时候。

也有一些像这一类的前政扣者，在以后的日子中，是生活在心灵备受干扰的状况之中，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残酷迫害，导致其中一些政扣者无法承受，选择了背弃战友，这种阴影不断地干扰着他们的心灵。

他们当中，有好些过后感到内疚，领悟到自己之前的错误，在经过自我反省之后，他们要向以前的战友寻求谅解，进行“赎罪”。于是，他们慢慢地以行动来进行“赎罪”。这显然是很好的做法，值得骄傲和可以成为学习的楷模！对我而言，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接受别人的批评和自我改造以朝向正确和真理的方向，都是值得赞美的美德。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品德也是如此。犯错和做错其实是人类的本能，并不是什么大罪，需要去粉碎及摧毁掉那个人的一生，剥夺他的前途。与此同时，它也不应该削弱人们的意志，一直扼杀了追求改变，要求进步和成功的决心。

单独监禁时期的审问，造成许多政扣者崩溃。因为，面对着那么严峻的考验，必须在摆在眼前的红萝卜和大棒子之间作一抉择的时刻，的确是对政扣者思想意识的觉醒的真正考验，那也将决定有关政扣者会作出怎么样的抉择。

甜蜜笑脸变凶了

如果说有人不吃那些政治部人员伸出的红萝卜，情况将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一位政扣者站稳立场，坚持拒绝改变所持的政治信仰，情况会怎样呢？如果他们拒绝承认失败，继续坚持相信他们是为真理而奋斗，而坚信胜利最后必然是在真理一方，情况又如何呢？

哈！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人民行动党政权的政治警察的走卒就要变脸了，他们即刻会来个

态度大转弯，之前一阵子还显露的笑脸，骤然之间变成凶巴巴的；原本“和蔼可亲”的斯文细语，语调突然之间提高了八度，成了骂人的高喊声。接下来就拉出大棒子或大藤鞭，要打人或揍人了。

这就是他们人类躯体上出现野兽暴行的时刻。那个躯体和那副模样，还是人的样子，精神、灵魂和行为却变得像一头凶恶的野兽。这，就是白皮肤洋大佬所谓的“解决”问题之道：任由像新加坡李光耀那样的残暴政权，采用“红萝卜和大棒子”来审讯政扣者。

一位拒绝吃下所塞给他的红萝卜，反而吐了回去的政扣者的遭遇，证明了“红萝卜与大棒子”这个词的真实意思。因为其立场坚定，同时为了维护真理和正义而表现出面对酷刑折磨的无比意志，这位政扣者遭受到“残酷的报复”。

这位政扣者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和神圣的人生原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牺牲的确是不可斗量啊！

### 无情的毒打

明月湾扣留中心的 C-6 座，我跟五、六位政扣者住了约五年时间，来了一位在 1976 年被逮捕的新政扣者，是一位二十多三十岁的青年。

我不知道为什么政治部会派那位新人跟我一起关在 6 号牢房。直到那一天，我已经被扣留了约 13 个年头，亲眼看到许多人被捕和许多人被释放，来来往往的，而我也从许多其他牢友口中听到各种酷刑和苦难经历的故事。

他进来我们这一座的第一天，我和其他牢友都热情地欢迎他，而他自己也看来很欢欣，虽然身子很虚弱，脸色也显得很苍白。我怀疑这个新人身上发生不对劲的事，于是立刻会见看管我们这一座的官员，申请要在第二天早上看医生。

晚上，这位新牢友无法合上眼睛。他急躁，讲话很快，似乎有太多的事要对我说。因此，他好像很担忧，怕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把心中的一切在那个晚上向我们倾泄。他好像很担心在没有把他的经历全部告诉我之前，就会被调到其他地方去。

我安抚他，叫他冷静和慢慢说话。这位新牢友会说流利的马来话，但在讲述他在被捕之后那段单独监禁期间的苦难经历时，却多数是讲华语。

我在那一整晚从这位新牢友所听到的一切，叫我对李光耀政权残酷迫害人民战士和他的政敌的手法，增添无比的愤怒。这个惨无人道的政权的所作所为，加强了 my 意志，要求自己为寻求真理、正义和人类幸福，对抗随时随地出现的暴政和酷行而继续奋斗。

### 为了不要出卖战友...

这位新牢友显然是在审问时被严刑拷打。他们对他拳打脚踢，他们残踏他的身子，毫无人性地把他们打倒在地，连续几个小时，连续几天，从白天到黑夜。他们不准他睡觉，只准“休息”几分钟，然后又横加殴打，因为他拒绝承认强加在他身上的假控状。他也拒绝招出那些还在监牢外斗争的战友。

虽然被政治部人员一而再地严刑逼供，他都拒绝回答有关本身的活动的问題，或招出他的

同志。他拒绝背叛他的同志。他还对我说，为了战友和组织的安全，他宁愿牺牲。

这年青人理应无条件被释放，不然，就必须像我们其他所有政扣者向李光耀政权所要求的那样：在公开法庭里给予审讯。这是一项民主的要求，是基本人权的要求，是国家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赋予的保障。

他被指控进行“地下”活动，“拿起武器”要推翻政府，但他们却无法展示任何证据。他在被捕时，并没像所指控的那样，身上带有任何武器。因此，他否认了一切的指控。他提出要求，如果真的像他们指控那样，就在公开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审讯。

由于坚决不对那些没有根据的指控认罪，这位年青人被殴打和施予酷刑，连续 22 天，不分昼夜……。

我看到他的眼睛滴出泪，闪闪发光。我相信那并不是悲哀的眼泪，也不是因为痛楚，而是意志的泪花，无比激情所化成的泪花。

狗见到鬼吠了

(此节略)

钦佩他过人的勇气

刚才提到的那位小伙子，起初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时，我就只是静静地听，什么也不说。不是自己没什么可说，而是我真的被李光耀政权那些残暴的爪牙的所作所为给吓惊了，以致不知所措。同时，我也很钦佩这位朋友面对暴力酷刑所表现出的意志，那些爪牙的暴行，我只曾在阅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时才领教过，只有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宪兵和德国纳粹主义的“盖世太保”（即“秘密警察”）才干出那样的坏事。

这个小伙子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是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他讲话一流，口若悬河，马来语很流利。由于曾经在偏远地区与人民群众一起生活，因而吸取了很多经验，也累积了许多很动人的群众事迹。

他也擅于唱歌，他唱群众之歌，农民之歌，渔民之歌和工人之歌，都是在反映一直以来被剥削的贫穷的平民的生活，活在贫困之中，没有保障，却也能活得穷开心。

在他跟我一起住在 C-6 座的约一年中，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我从他那儿学习到农民、渔民和工人的命运和斗争，在他之前，那些东西我只能是听来，或是在书本上读到的。这个小伙子亲身投入生活之中，在乡村、城镇、海滨及河岸，跟群众生活在一块。

被自己的头领所出卖

我后来促他继续把故事讲下去。他却皱了眉头，显然是不想讲下去了。可是，他最后还是开口了。在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他说：“赛，我被带进一个房间，原以为是要用来折磨我的。

“可是，我是怎么样的感到吃惊啊！我看到的是那个坐在那房子里的人，左右由两位政治部人员夹着，他竟然是我那一个组织的领导同志。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似乎还在梦幻当中，不能相信那个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正是我的

领袖。我深信他已经出卖了我和其他的同志，否则，他怎么能够在这么令人心痛和非常羞耻的情况下和我见面呢？”

我的那位新牢友告诉我说他那位前领导用很平和及毫不迟疑的语气，命令他“投降”，因为，他说他和他的同志已经没有再斗争下去了。

“我感到一阵慌乱，感到很愤怒，真想就在那儿扑过去揍他……。他是我曾经尊敬的领导，我绝对服从他关于我们斗争的政治理念的教诲，那样的话不该从他口中讲出来的。”他愤怒的咬牙切齿。

那位朋友闭上双眼，无法再说出他的懊恼和失望。于是，他低下头，开始呜咽着，哭了，压抑着他的怒火。我拍拍他的肩膀，劝他平下心情，要冷静。我递过一杯水给他喝。几秒钟之后，他继续谈他的故事。

由于是过度茫然和慌乱，根本就不知所措，所以，在那次会面中，他一句话也没对那位前领导说。那一次出乎意料的见面，被他形容为是无比耻辱和丢脸的。于是，他被带离那间房，被带到另一间房去。

宁死不降

在走向新的房间时，这位朋友下定了决心，他在心中立下了誓，尽管已经被自己的领导所出卖，他决不投降放弃。有史以来的头一遭，他决定违抗领导的命令。他已不再承认那个人为他的领导了。

与此同时，这位新朋友已经开始在沉思，对于自己在斗争中的忠诚奉献和忠于那个现在已被他本身的领导所出卖的组织感到懊悔，那可是他做梦也未有过的事。是那样难以置信，那个被他们高度崇拜和敬仰的同志，会毫不犹豫地背叛自己的组织和本身的战友和同志。于是，他感觉到自己一路来的牺牲和所承受的折磨似乎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意义”的。他也开始冥思苦想关于长久以来所做出的牺牲就这样“徒劳无功”，以致他再也无法让自己的思路能保持理性了。

于是，他就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不只是要为他的漫长斗争史划上句号，而且要结束自己本身的存在。他不愿意让他的敌人，即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特务，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已经折磨了他 22 天，他想，非常肯定的，他将继续被施刑，一直到他认输投降为止。

如果他的生命必须要结束，那就必须由他自己来结束，为了本身的尊严和英雄气概。这位朋友可不愿意栽在那些懦夫的严刑底下。

他已经立下决心要结束自己的一生。于是，他给自己的组织写下了遗书，说明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如何被捕，被严刑拷打，以及那场最令人蒙羞和受辱的与领导会面。为了避免自己也像那位领导那样走上叛变之路，他心甘情愿地作出上述决定，并对上述行动负起全责。

他给在外边的同志和组织写下了诀别书，“永别了，坚持战斗”。在遗书上签了名后，他拿起一片玻璃杯的碎片，割断自己手腕的脉。然后，他“安详和惬意”地躺在床上等待他生命最后一刻的来临。

人谋之，天成之

就在那时，我听到心底深处的细语，说这位朋友只是一位凡人，他在“谋”自己之死，可是，“成”或“不成”则由天来“决定”（其结局）。

果然不出所料，一位在那天值勤的辜加警察，突然间窥探他的牢房，发现他躺在床上，手沾满血，还流到了地面。辜加警察急忙打开牢房门，进入里面，及时赶到把他救了过来。

这个故事，座内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只对我一个人说。他过后有没有告诉其他人，我就知道了。我自己则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令人心痛的故事向他们或其他人转述。

这本书中之所以写下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希望让它成为每一个人或各造的经验教训和参考。

此外，那也是因为我感觉到是我的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知道详情，去暴露毫无人性的李光耀政权的残暴行为，他们在 20 世纪的六十和七十年代是如何的残暴对待新加坡的人民，甚至是全世界普世的人民也遭受其害。

### 医生看病

第二天，我会见到来检查我的新同志的监狱医生。我担任翻译，向星格赫医生反映那位新同志所遭遇的对待。我促请他进行检查和作报告，尤其是针对政治部官员所干下的酷刑和暴行。

我早就已经认识透了这位星格赫医生。他只是听着我们所作的任何投诉。他绝不作任何评语。他会重复我已经听过很多次的那几句话：“赛先生，请记住我只是一名医生。我会检查我的病人，并配药给他。”

新加坡有许多从印度过来寻找生计的印度医生，星格赫医生是其中一位。我在监牢里认识他已经不少过十年了。

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其他牢友都不对这位星格赫医生抱有什么厚望。然而，我们还是坚决认为，虽然他已经多次表明自己只是一名医生，不管政治和不涉及政治，我们还是得要向他传达正确和准确的政治信息。

在 C-6 座住了约一年之后，这位朋友被驱逐，遣回马来西亚。他接下来被马来西亚政府引用跟新加坡相似的内部安全法令加以扣留。他继续被扣留了好几年，才被释放。

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至今依然保持联络，而他跟太太及儿子经常来我在梳邦再也的住家拜访，特别是佳节期间，如开斋节。

## 第十二章 战友林清祥与何标

这一章，我特别要讲述另外两位在监牢里饱受李光耀政权施予各项酷刑的战友。他们是林清祥和何标。

### 林清祥如何被毁灭？

好几年前，我、陈仁贵和傅树楷聊起林清祥和何标两人所遭遇的厄运。我自己不曾跟林清祥扣留在一起，虽然彼此都是在 1963 年 2 月 2 日的同一行动下被捕的。在被单独监禁了好一段时日后，被调到樟宜监狱，我去“E 座监房”（E Hall），林清祥去“RB 座”（Block RB）。我



们三个人当中，陈仁贵曾经跟林清祥一起关在 RB 座。

虽然被隔绝，我依然不断听到各种关于林清祥的消息，或从牢友口中，或是来自监狱以外的消息来源。那各种各样的消息当然都不是正式的，都没有确实的证据，有些是不清楚的，甚至有一些是夸大的。可是，其真实性的根据还是有的。

有一点是公众已经确实知道的，因为它在报章刊登过。那就是李光耀献议立即释放林清祥，只要后者离开新加坡，移居到印尼去。清祥一口拒绝了，因为他看穿了其明显的肮脏用意。李光耀要把林清祥赶出新加坡，进而消灭他的首要政敌。清祥的立场严重威胁到李光耀的地位，因为，就算是在监狱里，他依然是反殖和反人民行动党斗争的象征。而李光耀很清楚知道，在跟领导社会主义阵线的林清祥争取支持方面，他必然会在竞争中败阵。清祥已经成了人民行动党的肉中刺。它要保持安全的话，就必须把刺拔掉，管它是用什么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报章报道说林清祥突然无缘无故地患上忧郁症和长时期的高血压。就像平常那样，监狱医生配药给他控制血压。可是，清祥的情况不但没好转，反而加重了。传闻说，他的举止也跟着变了，经常忧郁和自我孤立。这种举止很不寻常，以致造成“RB 座”的牢友感到可疑。药继续配给，可是清祥的忧郁症毫无减轻。最后，清祥被调去中央医院，据说他在那儿企图自杀。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包括一些窃窃私语，指责当权者必须对发生在林清祥身上的一切负起全责。

在各种各样的传闻中，最叫人可疑的故事是关于樟宜监狱的一位精神科医生给林清祥配治精神病的药，以治疗他的忧郁症。传闻指是这个药的效应最终造成林清祥在中央医院时企图自杀。更引人入胜的是，据说那位监狱精神科医生本身后来也自杀身亡了。其最后结果就如萧天寿 (Francis Seow) 在他的著作 *To Catch A Tartar—A Dissident in Lee Kuan Yew's Prison* 在谈到林清祥的不幸命运时所说的：“无论如何，关于这一件事的最后一句话还没写出来。”

### 林清祥获释时的状况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林清祥在自杀不成之后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据一些人的说法，他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摧残，精神受到巨大的伤害。事实是，就是在那样的健康状况下，林清祥在 1969 年获得释放。那还是在他以一封寄给社阵主席李绍祖的书信，宣布因为自己对斗争失去信心而退出政坛之后。

只有思路混淆和认识糊涂的家伙才会被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花招所蒙骗，相信那是林清祥是在意识清醒下自愿写下的“文告”。可是，我自己却深信，林清祥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在精神和肉体状况都紊乱情况下，被诱导那么写的。

过后，又听到说林清祥突然在一位精神医生和一位政治部高层人员陪同下，偷偷在 1969 年 7 月尾离开新加坡，飞去伦敦。

我也百分之百相信，这一出摧毁林清祥的阴谋戏曲，是一出极有历史意义，很别致和经过细心策划安排的政治大戏，由诸殖民主义爪牙所导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结束林清祥的政治生涯，以挽救李光耀的政治领导。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早在冷藏行动之前，英殖民者早已经认定，林清祥这位领袖，必须摧毁掉他的领导和威信。这意味着，为了挽救李光耀这位英帝宠儿的政治前途，必须把林清祥给消灭。这一点，可以参阅八打灵 INSAN 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的《林清祥与他的时代》英文版 (Comet In Our Sky) 一书中，里头收集了狄姆-哈柏

(T. N. Harper)、陈仁贵、拉惹古玛和格列-普尔格林因 (Greg Poulgrain) 关于林清祥的文章。

## 长空的一颗明星

1979 年，在伦敦渡过十年的政治流放生涯之后，林清祥和妻子携两个儿子回到祖国。正好就在这一年，我被释放，从住了 6 年的樟宜监狱和 1 年放逐到乌敏岛，回到新加坡本岛。我们于是重续自 1963 年 2 月 2 日以来就断绝了的联系。林清祥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但他的思路已经恢复敏捷了。在短短的一、两年内，我们经常会面，跟其他几位朋友，尤其是马哈迪哇和陈仁贵，一起聊关于昔日和今日的种种。

林清祥要见到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和繁荣国家诞生的理想，在他的精神上还是很鲜明的，那还是他的愿望和政治理想。因此，在我们经常进行的讨论中，曾经讨论重新发动像实现林清祥，也就是我们的政治理想的运动的可能性，虽然我们都认识到，现在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和气候，跟冷藏行动之前的斗争时代是天渊之别。

林清祥已经不在。他在 1996 年 2 月 5 日去世。可是，他依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如国家文学家乌斯曼-阿旺所描绘那样，林清祥的涌现在“历史的天空”，就有如“时代长空的一颗闪亮明星”。

## 何标忍受折磨

除了清祥，何标的事迹也叫人激动不平。何标是一位工人领袖，受中、英文教育。他跟我一样，在 1963 年 2 月 2 日的冷藏行动中被捕，可是，我们从不曾被关在一起。在中央顶层扣留中心 (TFC, Top Floor Central) 被单独监禁几个月后，何标被送到樟宜监狱的“BB 座”。那儿已经有约十位扣留者，包括林清祥、陈仁贵和莫水生，而我则是调到樟宜监狱的“E 座监房”。

像其他政扣者那样，何标未曾在公开法庭审讯，可是却在监牢里关了 13 年，从一个监狱调到另一个监狱。何标也像我一样，被国际特殊机构和《伦敦泰晤士报》选为良知牢民。在政扣者当中，何标以其坚定不移的立场而闻名。在监狱生涯中，他从不向监狱当局妥协或投降，更遑论那些“阿保仔”（即政治部人员）了。“红萝卜”这个诱饵，对象肯定不会是何标！

因此，何标就受到大棒子的无情对待，他们不准他睡觉和休息，以致他昏了过去。他们一连七日七夜殴打他。国际特赦机构，在其关于 1960 年代新加坡政扣者的报告中，详细地暴露了何标所遭受的折磨和迫害。何标现在定居英国。

虽然我从未曾跟何标关在一起，却也从陈仁贵和傅树楷口中听到相同关于何标的故事，那是在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在檳城渡假。树楷曾经跟何标、谢太宝、曾福华和云昌定一起在明月湾扣留中心，那是他在 1976 年第二度被逮捕和扣留时。陈仁贵则曾经在 1963 年至 1964 年间，跟何标和林清祥一起在樟宜监狱的“RB 座”。

## 第十三章 马克斯小组也遭迫害

李光耀政权不只对冷藏行动的政治扣留者进行残暴迫害，其他扣留者，包括被他们指为“马克斯小组”者，也遭受同样命运。连代表他们的律师萧添寿也被扣留。这一切，是萧添寿

在他的那本由美国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在 1994 年出版的 *To Catch a Tartar* 一书中所揭露的。

我认识“马克斯小组”的一名成员。她叫张素兰（音译，Teo Soh Lang），是位年青的律师。素兰和她的几位同伴在 1979 年我释放之后，在《亚洲研究杂志》任协调编辑时认识我。素兰和她的同伴非常关心新加坡当时的人权问题和社会经济之状况。在我看来，他们很显然对新加坡的民主受到污染，尤其是李光耀政权对人权的破坏感到不安。那是我对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政治倾向所得到的印象，尽管他们有好几次跟我一起喝茶或吃午餐，却从来没有邀请我讨论任何时事课题。

他们很想知道和听有关我在扣留营里的生活和经历。他们看来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被关在监牢里达 17 年那么久。实际上，连我本身都难以相信。自从我被释放之后，常常有人向我问同样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感觉到很难给予准确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瞧，在他们认识我之后不久，就自己被逮捕，跟我之前那样成了政治扣留者。这就是身为新加坡公民所面对的风险。这个风险经常会出现，往往就是在他们对新加坡的人权和民主课题表现出关心，并尝试要贡献力量和意见在这个国家确立民主和建立公平社会的时候。

### 李光耀的谎言

素兰和她的同道是在 1987 年 5 月 21 日被捕，原因好像是他们是“马克斯阴谋集团”的成员，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国家”。看了这样的胡言污蔑，我冷笑了。新加坡共产国？在 1987 年？真滑稽啊！为什么李光耀要愚弄新加坡人民呢？

还有，据说在背后操纵这项阴谋的黑手是陈华彪，一位被新加坡放逐的政治人物，已经在伦敦住了很多年。他是在 1970 年代中，当李光耀政权要逮捕他的时候，成功逃脱的。

所谓的“马克斯阴谋”，其实是李光耀在面对令他担忧的政治挑战时泡制出来的。看来李光耀也是很容易畏缩的。这跟他当时及之前的立场有所不同，总是对人挑战要进行公开的对抗。李光耀和他的政权的一切谎言，以及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劣行，被两本书给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两本书，所有相信真理、正义和民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都应该找来看。李光耀的政治面具，被两个新加坡儿女的作者给撕烂了，他们就是陈华彪和萧添寿，两人都是李光耀政权暴政的受害人。（参阅：*To Catch a Tartar*, Francis T. Seow 及 *Let the People Judge*, Tan Wah Piow, *Insan Kuala Lumpur*1987）。

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人还继续是政治流放者，分别住在英国和美国。其他的新加坡政治流放者包括在伦敦的 Francis Khoo 和何标；在澳洲的邓亮洪，在加拿大的傅树楷，而邓凤霞和许多其他人则分散在香港、中国、泰国南部和印尼。

### 在香港推介新书

（此节略）

### 再度被捕

当张素兰和她的同道于 1988 年 4 月在新加坡第二次被捕时，凤霞正好身在伦敦。再度被

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布新闻稿，讲述她们在监牢单独监禁时被政治部官员施刑的经历。她们的联合文稿令李光耀总理恼羞成怒，就下令再度逮捕她们。在第二次逮捕中，她们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最后被逼收回这之前所发表的联合文告。

前政扣者，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辩护律师萧添寿，他在 *To Catch a Tartar* 一书中，对这次事件着墨甚多。对于想了解新加坡在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史的新、马人民，必须读这本书。一直到今天，李光耀还是在新加坡当权，套用了三种官职称呼，开始时是总理（1959 至 1990 年），退居旁线后成为资政（1990 至 2002 年），最后在他的儿子李显龙在 2002 年 8 月 12 日出任总理时，变成 Mentor Minister，那或许也是全世界首次出现这样的职位。据说，这个职称是李光耀自己在参阅同义词词典之后亲自选的。

张素兰和她的同道所发表的那份叫李光耀老羞成怒的联合文告，其中作了以下的揭露：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 70 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审问，有些人站了超过 20 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掴，有些被掴不少过 50 次，而其他人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头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受到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 20 年后的今天还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这份联合文告有九名扣留者签署：董丽莉（Tang Lay Lee）、曾志成（Kenneth Tsang）、张素兰（Teo Soh Lang）、黄美玲（Ng Bee Leng）、张瑄芝（Chang Suan Tze）、叶汉源（Yap Hon Ngian）、黄淑仪（Wong Souk Yee）、Kelvin De Souza 和邓凤霞。（文告全文，参阅附录）

邓凤霞当然在她的同道重新被捕后无法回来新加坡。只要她一踏上新加坡的国土，就肯定会被捕。更何况，她在伦敦时已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采访，谈关于她在新加坡被扣留的事。

她所持的新加坡国际护照，在香港无法获得更新，因此，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后，邓凤霞的新加坡公民权就按李光耀政权通过的新条例，自动吊销了。在邓凤霞之前，陈华彪也在伦敦成为政治流放者超过十年之后，被自动吊销公民权。陈华彪丧失公民权，也是李光耀政权通过同一条条例加以褫夺的。

邓凤霞的呐喊

让我们来听一听邓凤霞内心的呐喊，以了解她在单独扣留期间的经历和各形各式的审问，那是跟其他扣留者，包括张素兰的呐喊有很多的共同点。邓凤霞讲述她被扣留时所受到的迫害和折磨，以及她在残暴的内安法令下，未经审讯而被扣留长达 85 天的感受。

1987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的晚上，凤霞在家里工作至深夜，备妥律师楼星期一的工作。她家墙上的钟显示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时分了，她于是进入睡房。她的丈夫彼德正睡得很酣。

过后不到一个小时，凤霞被响亮的敲门声所惊醒。她打开大门，一位政治部官员不请自进，然后问她的名字是不是邓凤霞。“我点头，他就告诉我说我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

那就是邓凤霞生涯中一项可怕经历的开始，她受到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官员那么残暴的对待。“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困，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凤霞被带进一间黑房，唯一的光线是来自两盏探射灯。那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房内有七或八个人。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开始向她抛来。凤霞还在惊吓之中，根本就听不清楚，在黑房内也看不到什么。

只有在取回她的眼镜之后，才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她所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离他们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

“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问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凤霞继续她的讲述。

接着下来，他们就采用肮脏、残暴和野蛮无耻的伎俩了。他们要胁邓凤霞，要永久永久扣留她。他们语带恐吓地问正被他们迫害和折磨的人，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被扣留 20 年之久。“我不肯相信他们。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在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 20 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

邓凤霞接着被乱套多项罪名。她已经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她首次开口反驳。可是，她还来不及继续她的反驳，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他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我摔倒在地下，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一巴掌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能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邓凤霞最后在 9 月 12 日被释放，总共被扣留了 85 天。“我离开扣留所，陪同我的是彼德（丈夫）和父母。我很高兴能够跟所爱的家人重逢，但我却不能够全身完整地踏出那扣留中心。有一部分的我还留在扣留中心。我更深一层地学习到要如何珍惜正义和自由。我绝不保持沉默，如果正义和自由不植入我们的基本人权里的话。那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当权者可以任意取消或剥夺的特权。”（参阅附录）

## “光谱”行动前扣留者之声明

“我们被指涉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使用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伎俩，颠覆新加坡现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以期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

“我们绝对及明确地否定政府对我们的指控。

“我们从来就不是涉及任何阴谋的马克思主义阴谋家。

“我们都不曾是秘密共产党员或属于马克思主义网络，而在被捕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互不认识或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我们更确切的属于社区及教会工作者，合法改革人士，业余戏剧爱好者，协助工人党的人士，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在新加坡行使言论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

### 扣留期间之待遇

“在我们被扣留期间，我们受到的待遇，是根本不应施诸在任何受盘问人士的身上的。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 70 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盘问，有的人站了超过 20 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搥，有些被搥不少过 50 次，而其他人士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首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 20 年后的今天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我们在扣留期间写各自的“声明”时，这些威胁一直在我们的心中。

他们很落力地劝阻我们寻求法律咨询及劝告我们休掉我们的律师和拒绝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包括出席内部安全法令的咨询团），以免破坏我们被释放的机会。

我们被迫上电视，并被警戒我们的释放有视于我们在电视上的表现。我们被迫作出像以下

这样的声明，“我们倾向马克思主义……；”“我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某某人是我的导师……；”“我被某某人利用……”，以牵连自己本身和其他的扣留者。

我们在电视上的谈话，经过编辑和评说，完全被歪曲和谬误呈现，给我们的行动和相互结交添加高度恶毒的用心。

我们再度明确及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从来未曾通过任何行动颠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从来不是任何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度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份子。如果需要，我们愿意在公开法庭证明我们的清白。

我们把自己视为是新加坡公民中最效忠和最具责任感的一群。我们深深感到遗憾的，不是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是我们的政府竟然感觉到必须中伤我们的良好声誉，并以我们做过或根本没做过的事为借口，逮捕、扣留及向我们施刑。

签名 Tang Lay Lee  
签名 Kenneth Tsang  
签名 Teo Soh Lung  
签名 Ng Bee Leng  
签名 Chng Suan Tse

签名 Yap Hon Ngian  
签名 Wong Souk Yee  
签名 Kelvin De Souza  
代签名 Tang Fong Har

#### 邓凤霞之声明

“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矇，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进行‘医药’检查后，我被带离那房间并走下一条走道。转了几转后，我到达一扇门前，打开后是通向地下室的梯级。

我走着，没有戴眼镜，只听到到处都是噪声。不同的人分几次走近我，每一个都用轻蔑嚣张的语气对我说，“哈！你就是邓凤霞啊！”，然后就走开了。地下室一片漆黑，除了那道刺眼的光以外。我被带进一间房里。

那是一间黑房，只有两盏探射灯，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那儿好象有七或八个人。冷气很大，吹得很强，而地下就只是水泥地板，我感到很冷和恐惧。

经过一阵感觉上是一段很大的恐怖的寂静之后，爆出了一串声音——“好啊！邓凤霞，你终于来了。”接着就是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向我抛来。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因为还在惊吓之中，适应不过来，而且我又没有戴眼镜。

抛向我的问题和指控，加上响亮的噪声维持了好一阵子。我是给吓呆了，于是就保持沉默。当我觉得不能再沉默时，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我的眼镜，因为它影响我的听觉。

他们把眼镜还给我。我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我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查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

在盘问过程的某个时刻，他们用永久无限期扣留要挟我，并问我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我选择继续保持沉默，他们可以等二十年或更久，就像他们已经等候谢太宝那样。

我不肯相信这事，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住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 20 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在整个过程中，那个男盘问者都在讥讽律师和法律专业，及贬抑我在法律协会的工作。

面对各种罪名向我扔来的当儿，我开口反驳，“现在，听我说，……”或是带相同意思的其他用词。我还来不及完成我的句子，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

我摔倒在地上，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攻击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那个女华人假装扶我站起来，并讲了像“没事，没事。别紧张。为什么你不合作呢？”之类的话。我不记得那个掴我的盘问者过后有没有留在房内。可是，我记得他的脸，并在较后知道他的名字叫 S. K. Tan。

接着他们盘问关于我在 5 月 21 日“逃离”新加坡的事，以及从那一天起到 6 月 8 日回来这段期间的行踪。我也必须解释我回来之后的行动。他们向我保证，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在法律协会里的工作，或是在 1984 年大选中协助阿历山大区工人党候选人柯列拉 (Corera)。

可是，我并未被告知对我的指控和罪状，直到他们向我发出扣留令那天才这么做。在提问/声明/罪状打圈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每一次上厕所，我都吐，并在回来后感到更冷了。我曾在厕所内镜子看自己，我的样子真是很恐怖。

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不穿乳罩。走路时，我都是弯腰曲背，以免暴露胸部。不久后，我的身体成了永久性半弯曲的形状。我无法制止自己发抖。我吐了无数次，而在第三天的早晨，我来月经，染红了囚裤。

我一直继续吐到第四天，这时我感到饥饿难忍了。我的一生中不曾感觉比这更恐怖谈的事。大约是十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离地下室，进去走道旁的一间房里，他们给我一张椅子。

管我案件的官员黄大卫坐在我对面，我们开始谈话。当我们讨论我的口供时，其他官员如 S. K. Tan，一个叫 Benny 的(宣称是内部安全局的第三号人物)，林宝贵和沈保兴会在不同时间各别走进来，‘澄清’一些点。

在我被逮捕之前，我的心中坚决相信，在这个滑稽行动下，从我和其他扣留者身上挤榨出来的供词是不能成立的，根本没有证明检验的价值。它根本就经不起法庭的检验。我从没做过什么颠覆的事，我也没有不效忠新加坡。它是当权者的国家，可也是我的国家。

我应该保持沉默而让他们随意对付我吗？我决定要写；可是，事后回想，我觉得，在描述



事情和人物时，我有时候不够小心，而我所写的东西被歪曲了——因而我就在致力于要保护他们时，却反而连累了他们，包括已经被扣留和还未被逮捕的。

他们从不给我机会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写供词。当我首次开始写时，还写不到两面，负责我的案件的那个官员看过后说：“这不行的，凤霞，你这是描写一项又一项的活动。那味道根本就出来，凤霞，你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并学习从他那儿找暗示。我只在他感到满意时才下笔。写那东西耗尽了我的精力。我感觉到筋疲力尽，就只是要弄完它，越快越好。然后，他们告诉我关于上电视的事……。”

(第二部分完，节录自 2007 年 5 月出版的《万千梦魇》中文本内“第一部：乌云笼罩新加坡；第二部：成为政治扣留者；第三部：战斗政扣留营；第四部：释放的开价；第五部：李光耀政权的受害者”有关章节)

#### 附： 囚 歌

坚定的反帝反殖斗士赛-扎哈利两部政治回忆录《人间正道》和《万千梦魇》，马来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 2001 年先后问世以来，大受新马以及世界各地新闻媒体和读者的好评和热议，就是马来西亚政府“或许也把这本回忆录视为有用的历史资料”。

作为资深的进步新闻工作者，赛前辈不仅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回顾了这几十年来新马的政治风云变幻，而且以其犀利的笔锋，捍卫新闻自由，维护自己的政治理想，坚定不移地追求公平正义民主；

作为一个曾经身受李光耀政权野蛮残酷迫害长达 17 年的受害者，赛前辈以蘸满自己和其他同一命运难友痛苦、愤恨的血泪的笔触，无情地揭露李光耀及其政权继承英殖民者的恶法——内部安全法令，蛮横镇压、逮捕、以及严刑拷打、折磨和迫害其政治对手的种种鲜为人知的法西斯罪行。

为了进一步了解和学习赛前辈的一身正气和高风亮节，兹将他被关押在李光耀政权长达 17 年的牢狱生涯中写下的马来文和英文诗篇介绍几首于下：

#### 黑 牢

多少眼泪标出  
多少嘶叫受制  
每一分钟 每一时刻  
在这黑牢中

多少鲜血流淌  
多少碎骨

散落在无言的地板  
在这新加坡岛上

不祥的肃静  
浑浊的空气  
熏天的霉臭 缭绕四周  
无处排去

我心灵的眼  
看见 魔鬼似的脸  
恶心的吆喝  
人类的呻吟

得意洋洋的野兽们  
想象着胜利属于他们  
听到它们的笑声吗  
那是作梦

每一滴眼泪  
每一滩血迹  
每一块碎骨  
绝不忘记

不但没有遗忘  
它们却化为革命种子  
如今正在抽芽  
长成一股庞大的力量  
它们必将茁壮  
把这批野兽扫荡  
而人民  
将不再害怕

1963 年

决 心

如果你有灵魂  
你有眼能看 有口能言  
呵 我多么幸运  
有你  
站出来作证

多么令人心碎啊

死寂把生命缠住  
已经那么长久  
还要多久  
我的脑海  
浮现  
问题一千个

前天  
你听到我的抗议  
昨天  
你听到我的呼吁  
今天  
你看到了我的厌恶  
……等着瞧吧  
到了明天  
我呵  
可要行动

决定既经作出  
意志也已铸成  
这残暴·  
这罪行  
我决不能任其放纵  
我一定  
全力反抗

1963 年

反 国 家

“反国家”他们说  
哪 这就是证据  
真的么  
如果  
粉碎殖民主义  
彻底反对帝国主义  
清除迫害  
消灭暴虐  
……就是“反国家”  
是的 我正是反国家  
如果  
埋葬  
歧视制度

一切不平 一切屈辱  
和封建主义  
……就是”反国家”  
是的 我再次承认“是的”  
我正是反国家

1963 年

呼 声

有一度

我感觉世界

我身体像要碎裂

希望落空

梦幻幻灭……

然而

我却是这样觉醒

我的耳朵

突然听见声浪

一阵比一阵尖, 一阵比一阵强

贫苦大众的声浪……

不是末日将来到

那是斗争烈火更炽旺

烧尽一切邪魔和压迫

最亲爱的人民啊

你们的呼声

给我的生命

注入了新精神

你们的呼声

带给我

力量万万千

1963年

机会主义者

昨天

他说他爱戴你

今天他抛下你孤零零一个

他从来就不曾爱戴你

昨天

他为你创伤哭泣

今天看到伤口还在流血

他摇一摇头

他从来就不曾对你同情

昨天

他以生命保证

要同你站在一起

今天他却不睬你

为了他 你受了凌辱

那就是他

无耻的机会主义者

1967 年

生而不自由

不是我不饿

我不想进食

不是我不想睡

我无法入眠

我的耳朵在倾听

一个婴孩的啼号

数月的单独监禁

是烦恼的根源

这数小时的等待

尽是有限的激动

接着传来

我的宝贝诞生的消息

我是孩子的父亲

自由已被夺去

我的世界

陷落在

小小的暗房

我的孩子

刚刚诞生

在一个还不自由的世界

1963年5月22日

历史的道路

不论你叫它甚麽名字

痛苦的含义

就是苦难

不论工农来自何族

大家都是

紧握铁锤 手挥锄头

不论身居何处

他们都是

一个民族 一种称呼

他们的力量何等强大

为全世界人类

作出最崇高的服务和贡献

然而·

正是他们

还受奴役

正是他们

还受挑拨

自相倾轧

他们

在枪尖下受桎梏

他们的汗水

却把压迫者养肥

但是

历史就是真理

历史的进程

谁也挡不了  
东风日益激荡  
斗争浪潮不断高涨  
红日在燃烧  
烧尽一切敌人  
照亮  
最后的胜利

1964年

    懦弱狗腿  
四年前的一天  
我被带进  
这暗无天日的地方  
单独监禁  
在一个阴沉沉的世界

我的世界？  
有个洞眼的水泥箱  
它有别的名堂  
牢笼 地狱 刑房

四年前  
他恫言  
在我脑袋打一枪  
向他挑战  
他却退却  
懦弱狗腿

这一回  
却以屈辱的自由  
取代了威胁  
悔过 出卖灵魂  
可以换取  
没有灵魂的自由

“你没有别条出路  
要吗屈服  
不然  
烂在牢里”  
我坚定 他们就不安  
他们的失败



早已注定  
谎言拆穿  
面具撕破  
他们退了  
剩下我自己  
在水泥箱里

1967年5月

悲 伤  
有些时候  
似乎无始无终  
白天异常短暂  
黑夜毫无尽头

在千百个烦厌的梦里  
群山倏地高起  
森林骤然密集  
河水不再流淌  
怒云布满天际  
大蛇吞下了月亮  
星星吓得全逃光  
在这黑夜里  
我什么也看不见

呵 太阳 你在何方  
我渴望你的光芒

1968年

白衣天使  
但愿  
我曾问过她的名字  
那位勇敢、好心肠的  
白衣天使

她的同事们避开我  
不是对我无礼  
而是  
那样子比较安全  
这是今天的一种保身之道

为什么不是呢？  
地生眼 墙有耳  
一切都属于  
高踞权位者

一步走错  
一句轻率反驳  
如果不是自由失去  
也会把饭碗打破

她们的下场  
肯定会和我一样  
那么  
谁又敢  
冒险介入

不能动弹已经很糟  
如果没有  
那位可敬的白衣天使  
我的生活  
将会更凄惨

她勇敢地突破藩篱  
伸出友谊之手  
问道  
“你好点么  
需要什么 请叫我”

我几乎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谈谈你的遭遇  
牢内生活究竟怎样”

我躺在床上  
注视她明亮的眼睛  
我也发现身边的守卫……  
两眼盯住她 两耳在倾听

她并不畏缩  
问题一个接一个  
我喃喃答复  
她似乎永不满足

很快地  
我忘了那天早上  
脚关节开刀  
造成的绞痛

我的寂寞  
在人群中消失  
在这个没有民主的岛上  
我找到了友谊

但愿  
我曾问过她的名字  
那位勇敢 好心肠的  
白衣天使

新加坡中央医院  
1968年7月

欢 乐  
丑恶的乌云  
久挂天空  
如今开始移动  
是强大的东风把它驱走

太阳冲出了重围  
越照越亮  
鸟儿唱着  
欢乐之歌

听 听那  
优美的旋律  
我心爱的曲调  
听 听吧

1969年11月27日

生日贺辞  
每过一年  
生活经验  
又加一层  
在斗争的途中  
另一个里程碑

又被跨越

回顾  
过去的失败与错误  
为了学习和改正  
回顾  
过去的成功与胜利  
为了启示和鼓舞

瞻望未来  
怀着信心与乐观  
期待  
更多的经验和斗争  
争取  
更多的胜利和成功

莎儿的诞辰  
1970年3月17日  
(莎儿乃赛前辈的妻子)

节录者注：

- 1、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节录赛前辈的这本政治回忆录《万千梦魇》的有关内容时，对极其个别的字眼作了一点变更，这点有请该书翻译者见谅；
- 2、最后附上的赛前辈的《囚歌》，根据该书翻译者赖顺吉先生按，是“采用1975年11月14日萌芽出版社出版的《囚歌》，除错别字外，皆保持原文”。